

# 目次

目次.....	I
<b>第一章 緒論 .....</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
<b>第二章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形成 .....</b>	<b>5</b>
第一節 古典學派關於經濟危機的爭論.....	5
第二節 馬克思對古典學派的批判論述.....	16
<b>第三章 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分流與評析 .....</b>	<b>40</b>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史的概述.....	40
第二節 對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各流派的評析.....	49
一、 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	49
二、 消費不足論.....	60
三、 利潤率下降論.....	65
<b>第四章 危機理論的建構 .....</b>	<b>76</b>
第一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的分析.....	76
一、 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	76
二、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86
第二節 資本積累的危機理論.....	90
一、 剩餘價值範疇的確立.....	91
二、 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區別.....	94
三、 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	95
<b>第五章 結論 .....</b>	<b>98</b>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全球金融風暴的蔓延，馬克思主義又重新受到注視。<sup>1</sup>與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不同，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痼疾，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當中，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來解釋為什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會週期性地發生經濟危機。時值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新低點，原本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大展身手的好機會。可是環顧百餘年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史的發展，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爭論至今都沒有解決。

由於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理論並未形成專門的一章，而是散落在**資本論**各卷，以及其與政治經濟學有關的著作當中。這造成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解釋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時產生分歧，並由此產生出許多不同的分類。<sup>2</sup>甚至據此認為馬克思根本不存在危機理論的說法。<sup>3</sup>

當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爭論的焦點，依舊圍繞在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為何。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家們對經濟危機發生原因的看法，總的來說，主要有消費不足理論、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與利潤率下降論等等三種流派。這三種流派的觀點雖然彼此對立，可是他們卻各自都能夠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支持的

---

<sup>1</sup> 尹德瀚，「金融海嘯 馬克思主義鹹魚翻生」，**中國時報**，2008年10月21日，  
<http://www.cooloud.org.tw/node/28794>。

<sup>2</sup> 高安邦比較了五位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經濟危機類型的分類。Paul Sweezy 將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分為「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危機」和「實現的危機」；伊藤誠將之分為「超額資本理論」和「超額商品理論」；Duncan Foley 認為可從「比例失衡」、「消費不足」和「利潤率下降趨勢」來區分；Kieran McKeown 將 Sweezy 的分類加入「實質工資提高所產生的危機」一項；最後，John Roemer 則分為「榨取利潤的危機」、「實現的危機」和「財政危機」。高安邦，**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頁122~123。

<sup>3</sup> Michael Heinrich，「存在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嗎？—進一步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中的『危機』概念」，**馬克思主義與現實**（北京），2009年第4期（2009年4月），頁11~20。

論述。這是否表示，或者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本身有矛盾，又或者是馬克思有三種甚至更多的關於經濟危機的觀點呢？

百餘年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家們，總是以現實的資本主義發展狀況出發，然後才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尋找符合現實發展的相關段落，以作出馬克思主義式的解釋。筆者以為，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軸，因此，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分析也不能脫離這一基本矛盾。唯有以這個角度，來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的相關論述，才能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獲得更全面的理解。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中文學界對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相關文獻，大都以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爭論，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史為主。而西方對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研究至今，基本上仍舊圍繞著消費不足、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與利潤率下降等三種觀點來發展。<sup>4</sup>由於這三種流派在各自內部的基本論點差異不大，因此下面筆者將以它們各自的主要論點來開展：

消費不足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在於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不平衡。因此，在消費不足論者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商品生產太多無法實現。故危機的原因是剩餘價值生產得太多，而不是太少引起的。主要代表人物為：考茨基（Karl Kautsky）、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斯威齊（Paul Sweezy）。

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者則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在於生產部門的比例失調。因此，只要維持生產的比例適當，不論消費是否減少都不會出現經濟危

---

<sup>4</sup> 雖然 1970 年代以後，出現了一些非單一因素的綜合性危機理論，不過主要還是在三種流派觀點的基礎上進行調和。例如，曼德爾（Ernesto Mandel）與韋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從多因素共同作用來說明利潤率下降、奧康納（James O'connor）從國家財政來分析經濟危機與賴特（Erik Wright）將各個單一因素的危機理論放置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來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爭論。楊健生著，**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年），頁 84。

機。主要代表人物為：杜岡（Mikhail Tugan-Baranowsky）與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而利潤率下降論者可分為三個方向，其一，是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引起利潤率下降視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主要代表人物為：格羅斯曼（Henryk Grossmann）、麥蒂克（Paul Mattick）與耶夫（David Yaffe）。其二，則認為由於工會力量的增強，使得工資提高擠壓利潤，從而造成利潤率的下降。主要代表人物為：英國的格林（Andrew Glyn）與薩克利夫（Bob Sutcliffe）及美國的博迪（Raford Boddy）與克羅蒂（James Crotty）。最後，是以資本競爭引起的生產過剩與產能過剩來說明利潤率的下降。主要代表人物為：布倫納（Robert Brenner）。

由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家，總是以馬克思的理論某些相關段落，來解釋符合現實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而不是從這些看似彼此對立的論述中，尋找可以將它們相互融合的內在的邏輯與聯繫。不過這裡指的融合不是指理論上的折衷，而是要找出這些表面上相互對立的論點之間內在的共同基礎。

筆者以為，消費不足、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與利潤率下降三種流派，從本質上來看，它們都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資本的再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然而，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家們忽略了這一內在的聯繫，使得他們的論點不僅彼此之間相互對立，且由於這種對立侷限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消費不足論者往往只關注於馬克思著作中，有關生產與消費的不平衡的論述，可是他們沒有看到馬克思這些論述背後，是以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為基礎。一旦抽掉了這一基本矛盾，則馬克思對消費不足的論述，便與古典經濟學家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或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消費不足論無異。

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者則只注意到，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的平衡與否的問題。好像只要維持生產部門比例的適當，無論消費如何減少都不會有危機。他們沒有看到正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要求再生產過程必須既要進行實物補償，也要進行價值補償。因而，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者不是把危機歸咎於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而歸咎於生產的比例失調。

以工資提高來解釋利潤率下降或以資本競爭來說明利潤率下降，是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與斯密（Adam Smith）的論點。而以資本的有機構成來分析利潤率下降，這一個規律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的邏輯推演出來的，如果不能夠融合另外兩個流派，在解釋現實的危機時將會遭遇困難。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必須從資本主義這一基本矛盾出發，才能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有比較準確的掌握。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是文獻比較分析法與歷史比較分析。首先，筆者要考察古典經濟學家內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對經濟危機看法上的爭論。再以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危機主流看法的批判，從中梳理出馬克思本人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觀點。

其次，筆者將按理論典範上的不同，以 1940 年為界限把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分為早期和現代兩個時期。一方面，從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的發展來探討時代背景的差異，對這兩個時期的理論家詮釋或發展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對這兩個時期的理論家們的論點做一概述。接著，筆者將以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從理論上來評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各流派的論點。

再來，筆者要考察在資本主義這一對象的認識方面，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家之間有什麼區別，再分析馬克思本人對政治經濟學方法的觀點，並比較古典經濟學家與馬克思在這一方法上的差異。例如，李嘉圖認為「在不同的社會階段中，全部土地產品在地租、利潤和工資的名義下分配給各階級的比例是極不相同的；...確立支配這種分配的法則，乃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sup>5</sup>而馬克思則指出，正因為拋開了生產和分配的這種內在聯繫，使得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將生產和分配看作彼此孤立的領域割裂開來，以致於產生把資本主義生產視為永恆的生產方式，而似乎只有分配才是歷史的產物這樣的錯覺。

沒有勞動價值理論作基礎，剩餘價值的概念就無從產生。沒有剩餘價值，資本就無法進行增殖和積累。因此，在最後一個部份，筆者將考察馬克思是通過哪些與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相聯繫的概念與範疇的確立，來建構出他的危機理論。

---

<sup>5</sup> Piero Sraffa 編，郭大力、王亞南譯，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

## 第二章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形成

從 1788 年開始，隨著機器在棉紡織業的應用，英國產業革命的過程中出現了新的現象－工業商品生產過剩。類似的現象反覆地發生於 1793 年、1797 年、1803 年、1810 年、1815 年和 1819 年，並且影響的範圍也向棉紡織工業以外的主要工業部門擴散。<sup>6</sup>為了對現實的經濟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古典學派內部圍繞著資本主義經濟會不會出現普遍生產過剩的問題展開了論戰。在第一節中，本文要探討參與這場爭論的古典學派正反兩方主要代表，各自從什麼角度來論證經濟危機的有或無。接著，在第二節則首先說明馬克思與古典學派對貨幣的看法上的差異。最後，通過對貨幣的分析，本文將介紹馬克思如何以此論證資本主義生產必然會爆發經濟危機，並由此形成他自己的危機理論。

### 第一節 古典學派關於經濟危機的爭論

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配第（William Petty）的著作中，已經將貨幣看作是一種流通手段。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布阿吉爾貝爾（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lebert）從使用價值的角度來看待財富，所以也就認為「金銀本身不是、也從來都不成爲一種財富。」<sup>7</sup>而斯密也同樣把貨幣只看作交換的工具。<sup>8</sup>

古典學派將貨幣視爲交易工具，主要是爲了反對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者認爲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式，佔有財富的方式就是取得貨幣。因此，在重商主義者看來，財富的源泉來自於流通領域中商品的出售，而財富的增加則是由於商品出售

---

<sup>6</sup> 陳岱孫，**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說發展論略**（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 年），頁 241~242。

<sup>7</sup> 轉引自：蔣自強、張旭昆、袁亞春、王如芳，**經濟思想通史第一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80~281。

<sup>8</sup> 斯密認爲「貨幣是流通的大輪轂，是商業上的大工具。」Adam Smith 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268。

的價格超過商品的價值，即「讓渡利潤」的結果。古典政治經濟學反映了從十七世紀開始，新興資產階級向商業資本爭奪地位的過程。爲了對抗重商主義，古典學派貶低貨幣的重要性，認爲貨幣只不過是爲商品交換提供便利性的工具。商品交換就其純粹型態來說是等價物的交換<sup>9</sup>，買低賣高不過是一種欺騙行爲，因而不是價值或財富增加的手段。古典學派認爲，既然貨幣只是一種流通工具，並且商品交換又是以等價物的交換爲前提。那麼商品交換的過程完全可以撇開貨幣這一中介物，而把商品交換的形式： $W-G-W$ （商品—貨幣—商品）還原成： $W-W$ （商品—商品）。到了十九世紀初，這個原先用來反對重商主義的觀點，就變成古典學派否認資本主義可能發生生產過剩的出發點。

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在 1821 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綱要**（*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中就已經提出上述的觀點：

一切商品從來不會缺少買者。任何人拿出一種商品來賣，總是希望把它換回另一種商品，因此，單單由於他是賣者這個事實，他就是買者了。因此，由於一種形而上學的必然性，總起來看，一切商品的買者和賣者必然保持平衡。因此，如果一種商品的賣者多於買者，另一種商品的買者必然多於賣者。<sup>10</sup>

另外，薩伊（Jean Baptiste Say）在 1814 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第二版中，提到：「在以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兩道交換過程中，貨幣只一瞬間起作用。當交易最後結束時，我們將發覺交易總是以一種貨物交換另一種貨物。」<sup>11</sup>也就是說，薩伊以爲商品交換實質上不過是物物交換，因此「銷路呆滯決不是因爲缺少貨幣，而是因爲缺少其他產品。」<sup>12</sup>且「單單一種產品的生產，就給其他產品開

---

<sup>9</sup> Karl Marx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80~181。

<sup>10</sup> 馬克思指出，事實上穆勒這個觀點早在他於 1808 年出版的**爲商業辯護**（*Defence of Commerce*）一書就顯露來了。詳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頁 87。

<sup>11</sup> Jean Baptiste Say 著，陳福生、陳振驊譯，**政治經濟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144。

<sup>12</sup> Jean Baptiste Say 著，**政治經濟學概論**，頁 143。

關了銷路」<sup>13</sup>，所以「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sup>14</sup>既然買者本身也是賣者，那麼從總體而言，社會總供給就會等於社會總需求。雖然「某一種貨物所以過剩，是由於它的供給超過需求。他的供給所以超過需求，則因為它的生產過多，或因為別的產品生產過少。正由於某些貨物生產過少，別的貨物才形成過剩。」<sup>15</sup>但只要沒有政治上的動盪與干預，薩伊認為這種情況決不會永久繼續存在。因此，商品普遍的生產過剩是不可能出現的。綜上所述，薩伊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而個別產品的生產過剩，實際上是因為其他產品的生產不足，只要沒有政府的不合理干預，市場會自動調節供給和需求的不平衡。

在論述經濟危機的問題方面，古典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嘉圖欣然地接受了薩伊的見解，並且在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特別指出：

薩伊先生曾經非常令人滿意地說明：由於需求只受生產限制，所以不論一個國家有多少資本都不會不能得到使用。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銷售；銷售則都是為了購買對於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於未來生產的某種其他商品。所以一個人從事生產時，他要不是成為自己商品的消費者，就必然會成為他人商品的購買者和消費者。我們不能認為他會總不了解為了達到自己所具有的目的——佔有他種商品——生產什麼商品對他最為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總是生產沒有需求的商品。<sup>16</sup>

李嘉圖在接受了薩伊的「生產會創造需求」的論點以後，便以此為根據來否認資本主義生產可能發生普遍的生產過剩：

產品總是要用產品或勞務購買的，貨幣只是實現交換的媒介。某一種商品可能生產過多，在市場上過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償還所用資

---

<sup>13</sup> Jean Baptiste Say 著，**政治經濟學概論**，頁 144。

<sup>14</sup> Jean Baptiste Say 著，**政治經濟學概論**，頁 142。

<sup>15</sup> Jean Baptiste Say 著，**政治經濟學概論**，頁 145。

<sup>16</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247。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序言」中，特別稱讚薩伊是第一個對供給和需求一致的原理加以解釋的著作家。Piero Sraffa 編，郭大力、王亞南譯，**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4。



本；但就全部產品來說，這種情形是不可能有的。穀物的需求受食用者人數的限制，鞋和衣服的需求受穿著者人數的限制。但是，雖然一個社會或其一部份可能具有他能夠或願意消費的那樣多的穀物和鞋帽，可是卻不能說每一種自然或人工生產的商品都是這樣。只要有財力取得，有些人就會消費更多的葡萄酒。另一些人有了足夠的葡萄酒以後又會想增添家具或改進其質量。還有一些人便想裝飾自己的庭園或擴建自己的住宅。每一個人心中都有做這一切事情或其中一部分的願望；所欠缺的只是資財；但是除了增加生產以外再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提供這種資財。<sup>17</sup>

在這一段話當中，李嘉圖承認個別的生產過剩是可能的，但普遍的生產過剩則不會發生。接著，他再從人類的消費慾望的無限性出發，試圖證明不會有超過需要的商品生產過剩。相反地，倒是存在一個無法被滿足的消費需求，因而消費只受到生產的限制。

早在斯密的理論中，就已經有了將儲蓄和投資視為一致的觀點。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一個人節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資本。這個增多的資本，他可以親自投下來雇用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給別人，使其能雇用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sup>18</sup>並且「每年節省的像每年花費的一樣，經常被消費掉，而且，幾乎是同時被消費掉。...因要圖利而直接轉為資本的每年節省下來的部份，也同樣並幾乎同時被消費掉。」<sup>19</sup>李嘉圖則更進一步地把儲蓄和投資一致的這種觀點與資本主義生產不可能過剩的看法聯繫起來。<sup>20</sup>他認為「積累的資本無論多少，都不會得不到有利的運用」<sup>21</sup>，並且由於消費的

---

<sup>17</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248~249。

<sup>18</sup> 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311。

<sup>19</sup> 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312。

<sup>20</sup> 斯密指出「當任何工業部門的產量超過該國的需求所需要的數額時，其餘額必然輸出國外，以換取國內有人需要的某種物品。沒有這種輸出，該國的生產勞動的一部分就必然會停頓，其年產品的價值就會減少。」因而在斯密看來，即使資本不會因為得不到有利的運用而發生過剩的情況，但工業產品卻有可能發生生產過剩。若不能及時地替這些過剩商品尋找國外市場，則生產這種商品的部門就會停頓。李嘉圖則反對斯密的這個看法，他認為只要還存在沒有被滿足的需求，則商品的普遍生產過剩便不可能發生，從而用來生產商品的資本也不會有過剩的情形。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248。

<sup>21</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247。

「需求是無限的—資本的運用只要還能產生一些利潤，便也是沒有限制的。」<sup>22</sup> 通過薩伊和李嘉圖的這番論述，資本主義不會發生經濟危機的觀點，成了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前主流經濟學的圭臬。<sup>23</sup>

另一些古典經濟學家從商品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的角度出發，卻得出與薩伊和李嘉圖相對立的看法。十八到十九世紀之間頻繁且日益嚴重的局部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得西斯蒙第意識到經濟危機已經是不能再以偶然性來解釋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現象。薩伊和李嘉圖相信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平衡是絕對的，不平衡只是相對，並且從不平衡恢復到平衡是一種經濟的規律。西斯蒙第不否認這種自我調節的傾向存在，但他認為正好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失調使得這種傾向無法實現。他以為在自給自足的小生產方式中，人們生產什麼以及生產多少都受到他們自己的消費所制約。但當生產方式轉變到資本主義制度以後，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完全改變了。西斯蒙第接受了斯密關於商品價值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的看法<sup>24</sup>，並指出任何一年的產品都是用前一年的收入來購買的<sup>25</sup>。他認為薩伊和李嘉圖所指稱的「商品以商品來購買」實際上是「商品以收入來購買」。從這個角度出發，他指出事實上生產服從於消費、生產的規模服從於社會收入的規模，只有消費的增加才能決定再生產的擴大，而消費則根據消費者的收入來調節。由此，西斯蒙第得出了與薩伊和李嘉圖截然相反的結論，即收入決定生產或生產決定於需求：

年收入的總量必須用來交換年生產的總量；通過這項交換，每個人  
都可以得到自己的消費品，並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年收入不能購買全部

---

<sup>22</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252。

<sup>23</sup>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針對經濟學家同行所著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便指出，例如古典學派的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與新古典學派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和庇古（Arthur C. Pigou, 1877~1959）等當時知名經濟學家的理論都深受「薩伊定律」的影響。詳見：John Maynard Keynes 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7~27。

<sup>24</sup> 斯密關於商品價值的看法歸納起來有三種，第一種是商品的價值由耗費在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決定的；第二種則是商品的價值由購買到的勞動（工資）決定的；最後一種是商品的價值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構成的。

<sup>25</sup>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著，何欽譯，**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76。

年生產，那麼一部份產品就要賣不出去，不得不堆在生產者的倉庫裡，積壓生產者的資本，甚至使生產陷於停頓。<sup>26</sup>

通過把「商品以商品來購買」轉變為「商品以收入來購買」，西斯蒙第企圖扭轉自斯密以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將目光聚焦於生產層面的偏見。他反對像斯密那樣只是考察財富，把增加財富看作是社會經濟的目的，並且認為只有讓個人在社會中自由地進行自利的活動，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而政府則應聽任經濟活動的自由發展而不加干預。相反地，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真正對象應該是人而不是財富，財富只是人類物質享受的對象，它只是一種手段，人類進行財富生產是為了解決自己的生活需要，並且政府應該介入使全民的物質享受增加，如此國民財富才能算是真正地增加了。<sup>27</sup>因此，西斯蒙第批評李嘉圖忽視人的需要，不重視消費，片面地強調生產與財富的增加。他認為消費才是生產的目的，生產是滿足消費的手段，分配是生產與消費的中介。資本主義會發生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一方面，生產和消費脫節。由於自由競爭的激化，加上大機器的應用與資本的不斷集中，生產者為了爭奪市場，不顧市場需求的實際情況盲目地擴大生產。另一方面，消費與收入在生產不斷擴大下不足。由於受資本主義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影響，生產的擴大不僅無法相應地增加社會收入，反倒使得廣大的勞動群眾在社會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不斷下降。雖然一個國家的社會總收入在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分配並不影響這個社會總收入的量，但這種收入的分配方式對市場，也就是消費卻產生極不利的影響。<sup>28</sup>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擴大與消費的日益縮小，使得資本家不斷地向國外尋找新的銷路。但這種辦法在西斯蒙第看來只是徒勞。他指出：

一切生產超過消費的國家一致注視著這個國外市場，好像國外市場寬廣無垠似的。但是，自從航海發達，陸路開通，安全有了進一步保證以來，人們開始看出，世界市場和從前各國的國內市場同樣地狹小；一切生產者向外國出售的普遍信譽，幾乎使各地的生產都超過了需求。<sup>29</sup>

---

<sup>26</sup>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頁 76。

<sup>27</sup>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頁 22。

<sup>28</sup>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頁 216~218。

<sup>29</sup>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著，*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頁 218。

西斯蒙第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矛盾的制度，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無限制地發展和財富的增加，而另一方面作為前者基礎的群眾消費卻侷限於生活必需品的範圍。由此，他意識到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不平衡引起的經濟危機，並不像薩伊和李嘉圖所稱只是偶然或局部的，而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必然的結果。故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由於生產超過消費，生產出來的商品必然有一個或大或小的部份不能實現，即消費不足所引起的。

西斯蒙第對薩伊與李嘉圖等人的上述批判，受到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支持。與西斯蒙第的論證方式不同，馬爾薩斯是從李嘉圖理論體系本身的缺陷切入。他指出李嘉圖理論體系中兩個矛盾，一是從勞動價值理論出發，無法解釋資本和勞動的交換；二是勞動價值理論無法說明，何以等量資本所使用的活勞動不等，卻能得到相同的利潤。

關於第一個矛盾，馬爾薩斯指出，既然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那麼商品的價值理應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可是李嘉圖卻又承認利潤的存在，並且認為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與一般的商品交換一樣是等價交換，而非任一方買低賣高或賤買貴賣。如此一來，利潤的來源就無法解釋了。如果承認利潤存在，那麼勞動價值理論就無法成立；如果堅持勞動價值理論，則利潤就不能存在。不過這兩種解決方法卻是李嘉圖無法接受的，因而這個問題就成了李嘉圖理論體系本身的矛盾之一。<sup>30</sup>

---

<sup>30</sup> 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一章第一節標題就寫道：「商品的價值或其所交換的任何另一種商品的量，取決於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而不取決於付給這種勞動的報酬的多少。」這裡的意思就是說，李嘉圖以為，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而與為了生產它而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多寡無關。因為，對李嘉圖而言，利潤就是商品價值扣除掉工資之後的餘額。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7。至於工資，李嘉圖在前書第五章「論工資」的開頭便指出：「勞動正像其他一切可以買賣並且可以在數量上增加或減少的物品一樣，具有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勞動者維持自身生活以及供養保持其人數不變的家庭的能力，不取決於他做為工資所能得到的貨幣量，而取決於用這一筆貨幣所能購得的食物與必需品量，以及由於習慣而成為必不可缺的享用品量。因此，勞動的自然價格便取決於勞動者維持其自身與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價格。食物和必需品漲價，勞動的自然價格也會上漲，這些東西跌價，勞動的自然價格也會跌落。」由上可知，李嘉圖認為工資是由勞動者維持自身及供養家庭所需的食物與必需品的量構成的，而工資的下跌或上漲又是由這些食物與必需品的價格的下跌或上漲來調節。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77。所以在李嘉圖看來，勞動的

關於第二個矛盾，李嘉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的變動與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量無關，前者是因流通過程中產生的資本構成上的區別—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的比例不同，所使用的固定資本的耐久程度不同，流動資本週轉時間不同—引起的。他指出：

在機器或耐用資本還沒有大量使用的早期社會裡，等量資本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是接近相等的，彼此之間的相對價值只會由於生產所需的勞動量的增減而有漲有跌。但在採用了這些昂貴而耐用的工具之後，使用等量資本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就極不相等了。彼此之間的相對價值雖然仍舊會由於生產所需的勞動量的增減而有漲有跌，但同時也會由於工資和利潤的漲落而發生另一種雖然是次要的變動。由於售價五千鎊的商品所用的資本量可能等於售價一萬鎊的其他商品生產所用的資本量，所以兩者的製造利潤也會相等。但如果商品的價格不隨利潤率的漲落而變動，其利潤就會不相等了。<sup>31</sup>

---

自然價格指的是一定量的食物或必需品，而與工人在商品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量無關。既然勞動的報酬已經由工資支付了，那麼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就與一般商品交換一樣是等價交換。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指出，李嘉圖的理論體系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矛盾，主要是由於他混淆了「勞動」與「勞動能力」的區別。詳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頁449~474。

<sup>31</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34。關於這一點，馬克思以為李嘉圖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矛盾，由於他在考察問題時，已經先將「平均利潤率」或「一般利潤率」這個競爭領域的範疇，當作假定的前提納入他的研究中，使得他將商品的「費用價格」（即生產價格=成本價格+平均利潤）和商品的「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餘價值）混淆起來。詳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177~240。成本價格等於某一定量的生產資本週轉一次所耗費掉並加入產品價值的那部分價值。資本週轉的時間與次數，與該資本的固定不變資本（機器、廠房與設備等等）與流動不變資本（原料或輔助材料）的物理性質有關。如果不考慮資本的週轉時間與次數，單就預付資本的價值量來看，則成本價格就會等於不變資本加上可變資本的價值。而商品的費用價格（生產價格）與商品的價值是否相等，則取決於該資本的有機構成（資本的構成要從雙重的意義上來理解。從價值方面來看，資本的構成是由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或者說，分為生產資料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即工資總額的比率來決定的。從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方面來看，每一個資本都分為

如上所述，雖然由於機器和耐久工具的採用，使得商品的相對價值<sup>32</sup>發生變化，但李嘉圖還是堅持認為，商品的價值主要還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sup>33</sup>

馬爾薩斯指出按照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商品的價值從而資本的利潤，應該和它所使用的勞動成比例。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尖銳地指出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中存在的現象，即等量資本不管它們各自推動的活勞動多少都能夠得到等量的利潤。他反駁李嘉圖說：

斯密說過，穀物一年就可成熟，而肉用牲畜卻需要餵養 4—5 年才能屠宰；因此，如果我們拿交換價值相等的一定數量的穀物和一定數量的肉相比較，那就可以肯定，不考慮其他因素，單是多出的 3 年或 4 年的利潤（按生產肉類使用的資本 15% 計算）的差額，就會使一個少得多的勞動量在價值上得到補償。可見，兩個商品的交換價值可以相等，而一個商品中的積累勞動和直接勞動卻比另一個少 40% 或 50%。

---

生產資料和活的勞動力；這種構成是由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為使用這些生產資料而必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比率來決定的。我把前一種構成叫做資本的價值構成，把後一種構成叫做資本的技術構成。二者之間有密切的相互關係。為了表達這種關係，我把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並且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凡是簡單地說資本構成的地方，始終應當理解為資本的有機構成。（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72。）的高低。如果該資本的有機構成正好等於總社會資本的平均構成，則該資本的商品的費用價格就會等於它的價值；如果該資本的有機構成高於總社會資本的平均構成，則該資本的商品的費用價格就會高於它的價值，反之，則該資本的商品的費用價格就會低於它的價值。

<sup>32</sup> 相對價值在這裡指的是兩種商品之間交換的比例，如 1 磅糖=2 磅咖啡。關於李嘉圖的相對價值與絕對價值的區別，詳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187~190。

<sup>33</sup> 馬爾薩斯反對李嘉圖堅持的「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這一觀點，他指出即便是提出這一觀點的斯密，也認為這個觀點已經不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了。故馬爾薩斯以為商品的價格在當前，已經不以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相反地，是由利潤率來決定的。他說：「所謂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和它們所費的勞動量成比例這一學說，究竟怎樣呢？並非商品所耗的勞動量不變，商品的價值就不變，而似乎是由於大家所熟知的經常而普遍起作用的原因，除了極少數例外，一切商品的價格都是隨著利潤率和利潤量的變動而變動的。」Thomas Malthus 著，廈門大學經濟系翻譯組譯，**政治經濟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年），頁 79。

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大量最重要的商品來說，這是常見的事情；如果利潤從 15% 降到 8%，肉的價值和穀物相比就會降低 20% 以上。<sup>34</sup>

由於現實上總是存在上述的現象，因而在馬爾薩斯看來，李嘉圖所謂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這一規則反倒成了例外。他說：

李嘉圖先生自己也承認他的規則有相當多的例外；但是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些他所謂的例外的情況，即使用的固定資本量不同，耐久程度不同，使用的流動資本週轉時間不同，那麼我們就會發現，這些例外情況如此之多，以致規則可以看作例外，而例外可以看作規則。<sup>35</sup>

除了指出李嘉圖理論體系本身的兩個矛盾以外，馬爾薩斯進一步從斯密那裡尋找能夠把以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來解釋商品價值的論點排除出去。他指出：

亞當·斯密在論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一章中，認為勞動是價值的普遍而準確的尺度。由於他沒有嚴格地遵循自己所提出的以勞動作為尺度的同一方法，因而給自己的研究帶來了一些混亂。

他談到商品價值時，有時是用生產商品所費的勞動量為尺度，有時又用商品所能交換的勞動量為尺度。

然而，他最常使用的尺度是指後一種意義而言，顯然他十分著重這一點。他說：「對一個佔有商品，自己不使用或消費而準備用以交換其他物品的人來說，商品的價值等於他能用以購買或換取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sup>36</sup>

---

<sup>34</sup> 轉引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 23。

<sup>35</sup> 轉引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頁 25。

<sup>36</sup> Thomas Malthus 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74。

再進一步，他指出就連斯密在談到更高級的社會，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時，也已經將前一種，即以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作為尺度的這一用法否定掉了。並且馬爾薩斯以為，用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或衡量商品的互相交換的比例的方法，在人們所知道的社會發展階段中都無法達到這個目的。相反地，利潤在很早的時期就已經作為供給的一個必要條件，廣泛地被考慮在交換價值的問題之內了。<sup>37</sup>據此，馬爾薩斯就從重商主義的「讓渡利潤」和供需的觀點來闡述自己關於商品價值如何決定的問題。他認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取決於該商品在市場上能夠換取的勞動決定。他說：

當我們根據亞當·斯密所最常使用的意義，把勞動看作是價值尺度時，也就是說，當一種物品的價值是以它所能換取的一定種類的勞動量來計算時，勞動就顯得是和其他一切尺度在實質上不同的一種尺度，而且能夠按照問題性質所能允許的程度，最接近於一種相對交換價值和內在交換價值的標準尺度。...例如，在同一地點和同一時間，商品所能換取的日勞動量顯然恰好同它的相對交換價值成比例；如果兩種商品能夠購買同量的同類勞動，它們就會對等交換。<sup>38</sup>

而商品的價值依照生產它所需的生產要素，又可分割為工資、利潤和地租三部份<sup>39</sup>，並且根據讓渡利潤的觀點，馬爾薩斯認為商品所能換取的勞動量必然等於生產這個商品所花費的勞動量再加上利潤。<sup>40</sup>也就是說，他以為商品在市場上可以換取到的勞動量必然等於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再加上與預付資本成比例的普通利潤。因而只要上述條件能夠得到滿足，即商品的價格既能夠補償生產它

---

<sup>37</sup> Thomas Malthus 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75。

<sup>38</sup> Thomas Malthus 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81~82。

<sup>39</sup> Thomas Malthus 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68。

<sup>40</sup> 「商品的所值通常被認為是多於它的所費（包括正常利潤在內）。」Thomas Malthus 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69。可見「利潤」或者說「平均利潤」這個資本競爭領域的範疇，一開始就作為前提被馬爾薩斯納入商品價格的考量之中。而這一觀點早在斯密的著作中就已經顯露出來，他說：「在每一個社會及其鄰近地區，各種用途的勞動的工資以及各種用途的資本的利潤，都有一種普通率或平均率。...地租也有一個普通率。」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49。



所需的勞動量，且還能提供平均利潤，那麼這個價格就是商品的有效需求。<sup>41</sup>

從讓渡利潤的角度出發，因而在馬爾薩斯看來，資本家之間的相互買賣與工人的支出不足以構成充分的有效需求。在資本家之間的商品交換中，每個資本家既是賣者也是買者，因而資本家之間的交換無法實現全部的利潤。而工人工資的支出，也只能買回他自己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一部分。故馬爾薩斯認為，除了資本家和工人以外，必須存在第三類的買者，並且是一個只消費而不生產的階級。<sup>42</sup>他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缺點，由於資本家傾向將收入用作資本積累而不注重消費，而工人也不能消費掉超過他工資的商品量，如果不存在一個只消費不生產的階級，則資本主義生產就會發生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因此，馬爾薩斯以為這個只消費不生產的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在於，保持產品與消費的平衡，使利潤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從而促進財富的增長。<sup>43</sup>

「薩伊定律」雖然受到西斯蒙第和馬爾薩斯等人的挑戰，但終究不影響它在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即使後來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沒有否認這一定律的正確性，而是認為現實上供給和需求的平衡必須通過國家干預的手段來達成。因而，在主流經濟學看來，似乎只要能達成供需之間的平衡，不論這樣的平衡是通過自然的還是人為的手段來達成，都能夠避免或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 第二節 馬克思對古典學派的批判論述

馬克思認為，產品生產與商品生產這兩種社會生產形式有著本質上差別，在前一種形式中，交易的目的是為了消費；而在後一種形式中，交易的目的卻是為了使價值能夠增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正是因為錯誤地將社會生產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的形式看作社會生產的一般的、永恆的形式，因而無法理解為消費而交換

---

<sup>41</sup> 「商品的有效需求就是一種能滿足商品供給的自然和必要條件的需求；...它是需求者在實際情況下為了使所需商品能夠不斷地獲得足夠供給而必須支付的代價。」Thomas Malthus 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71。

<sup>42</sup> 馬爾薩斯特別指出：「在這個階級中，地主無疑地居於顯著的地位。」Thomas Malthus 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328。

<sup>43</sup> Thomas Malthus 著，**政治經濟學原理**，頁 337。

與為交換而交換之間的不同。因此，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自然也就只是從交換手段這一概念來掌握貨幣形式。

誠然，貨幣作為交換手段是社會的抵押品，但貨幣之所以具有這樣職能，不過因為它是社會關係物化在特定商品上的表現形式。因此，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將貨幣僅看作交易工具的觀點不同，馬克思認為貨幣的出現是與商品生產分不開的。從商品交換過程的內部來分析貨幣起源，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sup>44</sup>對貨幣的分析不僅是馬克思與古典學派（特別是李嘉圖）在勞動價值理論上的重要區別，也是馬克思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會發生經濟危機的基礎。因此，本節首先要從馬克思對商品形式的分析出發，說明商品與貨幣之間的關係。

既然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財富的元素形式，且貨幣形式本身又是通過商品形式的發展而出現的。那麼，對貨幣起源的分析就不能不從商品形式出發。

從使用價值和價值這兩個因素切入，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通過自己的物質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求的物。因此，就物的有用性而言，它使商品成為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sup>45</sup>雖然物的使用價值與人取得它所耗費的勞動量無關，但在資本主義這一社會形式中，使用價值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交換價值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係或比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只要比例適當，一種使用價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種使用

---

<sup>44</sup> 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總是從商品交換過程的外部，或者從使交換過程變得方便的觀點來尋找貨幣的起源：「經濟學家慣於從擴展了的物物交換所遇到的外部困難中去尋求貨幣的起源，卻忘記了這些困難是從交換價值的發展、因而是從作為一般勞動的社會勞動的發展中產生出來的。...經濟學家在藉口考察簡單的物物交換時，看到了作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直接統一體的商品存在所包含的矛盾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他們始終堅持物物交換是商品交換過程的最適當形式，只是在技術上有某些不方便，而貨幣是為了消除這些不方便被巧妙地設計出來的手段。」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444。

<sup>45</sup> Karl Marx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頁48。

價值完全相等。」<sup>46</sup>因此，「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sup>47</sup>例如一斤米與 x 量麵粉或 y 量豬肉或 z 量番茄相交換，則一斤米就有許多種交換價值或交換比例。既然 x 量麵粉、y 量豬肉、z 量番茄等等都是一斤米的交換價值，那麼，它們就都代表等量的或同樣大的交換價值。

「由此可見，第一，同一種商品的各種交換價值表示一個等同的東西。第二，交換價值只能是可以與它相區別的某種內容的表現方式或『表現形式』。」<sup>48</sup>如果拿兩種商品例如麻布與上衣相比較，不論它們之間交換比例如何，總是能夠以一個等式來表示一定量的麻布等於若干量的上衣，如 20 碼麻布=1 件上衣。這個等式說明在 20 碼麻布和 1 件上衣中，有一種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因而麻布和上衣二者都等於這第三種東西。這共同的第三者本身既不是麻布也不是上衣，但麻布和上衣只要作為交換價值，就必定能化為這第三種東西。

然而這個共同的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天然的或物質的屬性，並且商品的交換關係的明顯特點就在於抽離掉形成商品各自的使用價值的物質基質。如果將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暫時撇開，則商品體就只剩下「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因此，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商品使用價值的各式各樣的勞動的有用性質與勞動的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麼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sup>49</sup>因此，抽象人類勞動作為勞動產品所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

通過對資本主義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考察，從而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本身也反映出二重性。「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sup>50</sup>但決不能因此就說勞動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二重性，「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

---

<sup>46</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50。

<sup>47</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50。

<sup>48</sup> 因為交換價值只是這一等同的東西的表現方式或表現形式，但這樣還不足以說明這一等同東西的「內容」為何。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49。

<sup>49</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51。

<sup>50</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0。

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sup>51</sup>相反地，勞動的二重性只是在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中才表現出來。

商品是以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形式出現的，例如砂糖、米、麻布等等。這是商品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商品之所以是商品，只因爲它們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因此，它們表現爲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因爲它們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與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反，商品的價值對象性或價值形式既碰不到也摸不著：

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們記住，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麼不用說，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係中表現出來。<sup>52</sup>

可見，價值的對象性只有通過商品與商品之間的關係或交換比例才能表現出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形式是商品最普遍且一般的價值形式，幾乎每種商品的所有者都竭力地使自己的商品轉化爲貨幣。但爲什麼一切商品都把貨幣形式當作彼此共同的價值形式？這一點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並沒有說明。<sup>53</sup>因此，在這裡馬克思打算從商品的價值形式出發，通過價值形式的發展來分析貨幣形式的產生，並以此說明何以商品流通必然會導致商品分化爲商品和貨幣。<sup>54</sup>

---

<sup>51</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56。

<sup>52</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1。

<sup>53</sup> 斯密在談到貨幣起源時指出：「不論任何國家，由於種種不可抗拒的理由，人們似乎都終於決定使用金屬而不使用其他貨物作爲媒介。金屬不易磨損，...而且，它不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還能任意分割，而全無損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這性質卻爲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沒有的。金屬的這一特性，使金屬成爲商業流通上適宜的媒介。」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21。斯密僅僅從金屬的物質屬性來說明它適宜作爲貨幣，但他始終沒有說明，何以一切商品都要求以貨幣來表現自己的價值。

<sup>54</sup> 「困難不在於了解貨幣是商品，而在於了解商品怎樣、爲什麼、通過什麼成爲貨幣。」Karl Marx

20 碼麻布=1 件上衣。「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因此，分析個形式確實困難。」<sup>55</sup>在這個價值形式當中，麻布處於「相對價值形式」起主動作用，而上衣處於「等價形式」或者說作為「等價物」起被動作用。任何事物都不能夠自己表現自己，因而必須通過他者來表現自己。在這裡也是一樣。在 20 碼麻布=1 件上衣這個價值形式當中，麻布必須通過上衣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上衣作為表現麻布價值的等價物，必然是因為上衣和麻布彼此都有某種共同的東西，因而才能夠彼此通約。

首先從質和量兩方面來考察「相對價值形式」：

要發現一個商品的簡單價值表現怎樣隱藏在兩個商品的價值關係中，首先必須完全撇開這個價值關係的量的方面來考察這個關係。人們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們在價值關係中只看到兩種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們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為同一單位後，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為同一單位的表現，才是同名稱的，因而是可通約的。<sup>56</sup>

從質的方面而言，「麻布和上衣作為價值量是同一單位的表現，是同一性質的物。麻布=上衣是這一等式的基礎。」<sup>57</sup>在勞動的形式上，縫上衣的勞動是一種與織麻布不同的具體勞動。但是，把縫看作與織相等，實際上就是把縫化為它們作為人類勞動的共同性質—抽象人類勞動。

但光是說明勞動的特殊性是不夠的，因為人類的勞動力本身不是價值。必須使人類的勞動力表現為「對象性」，即凝固或者說物化在某物上但又和某物的自然屬性不同。在 20 碼麻布=1 件上衣這個價值形式當中，上衣是當作和麻布同質的東西，是當作同一性質的物，因為它是價值。上衣是以它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來表示價值的物，以它作為使用價值的自然形式表現麻布的價值的物：

---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10。

<sup>5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2。

<sup>56</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3。

<sup>57</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4。

商品麻布的價值是表現在商品上衣的物體上，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上。作為使用價值，麻布是在感覺上與上衣不同的物；作為價值，它卻是「與上衣等同的東西」，因而看起來就像上衣。麻布就這樣取得了與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它的價值性質通過它和上衣相等表現出來，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過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現出來一樣。<sup>58</sup>

從量的方面而言，「凡是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sup>59</sup> 一定量的商品包含著一定量的人類勞動。故價值形式不只要表現價值，而且要表現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因此，「『20 碼麻布=1 件上衣，或 20 碼麻布值 1 件上衣』這一等式的前提是：1 件上衣和 20 碼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樣多的價值實體。就是說，這兩個商品量耗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或等量的勞動時間。」<sup>60</sup>

接著，馬克思考察「等價形式」，並且指出它的三種特點：

首先，使用價值成為它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在 20 碼麻布=1 件上衣這個價值形式當中，上衣處於等價形式或作為等價物來表現麻布的價值。在這裡麻布和上衣的交換比例，取決於上衣的價值量。而上衣的價值必然由生產上衣所必須的勞動時間決定，但是當上衣處在等價物的位置上時，上衣的價值量就以它的自然形式的「數量」來表現，如「1」件上衣：

在價值等式中，等價物始終只具有某物即某種使用價值的單純的量的形式，對這一事實的膚淺瞭解，使貝利同他的許多先驅者和後繼者都誤認為價值表現只是一種量的關係。其實，商品的等價形式不包含價值的量的規定。<sup>61</sup>

在 20 碼麻布=1 件上衣的價值形式當中，麻布不能把自己當作等價物來和

---

<sup>58</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6。

<sup>59</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7。

<sup>60</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7。

<sup>61</sup> 薩米爾·貝利 (Samuel Bailey, 1791-1870) 英國經濟學家。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70~71。

自己發生關係，因而也不能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型來表現它自己的價值。它必須把上衣當作等價物，或者說通過上衣的自然外型來表現它自己的價值。故在這個價值形式當中，上衣的自然形式或者說上衣的使用價值，作為等價物表現了麻布的價值。因此，馬克思便指出：

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把自己的價值表現為一種與自己的物體和物體屬性完全不同的東西，例如表現為與上衣相同的東西，因此，這個表現本身就說明其中隱藏著某種社會關係。等價形式卻相反。等價形式恰恰在於：商品體例如上衣這個物本身就表現價值，因而天然就具有價值形式。當然，只是在商品麻布把商品上衣當作等價物的價值關係中，才是這樣。但是，既然一物的屬性不是由該物同他物的關係產生，而只是在這種關係中表現出來，因此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價形式，天然具有能與其他商品直接交換的屬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屬性或保暖的屬性一樣。從這裡就產生了等價形式的謎的性質，這種性質只是在等價形式以貨幣這種完成的形態出現在政治經濟學家的面前的時候，才為他的資產階級的短淺的眼光所注意。<sup>62</sup>

其次，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充當等價物的商品的物體總是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化身，同時又總是某種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產品。因此，這種具體勞動就成為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sup>63</sup>縫上衣的勞動和織麻布的勞動一樣，都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從價值的生產的意義上來看，這兩種勞動並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上就反過來了。把縫上衣的這種具體勞動，作為抽象人類勞動的可以捉摸的現實形式與織麻布的勞動相對立。

最後，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社會勞動的表現形式：

既然這種具體勞動，即縫，只是當作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表現，它也就具有與別種勞動即麻布中包含的勞動等同的形式，因而，儘管它同其他一切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私人勞動，但終究是直接社會形式上的勞動。正因為這樣，它才表現在一種能與別種商品直接交換的產品上。

---

<sup>62</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72。

<sup>63</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72~73。

各種勞動產品都是私人勞動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看來，生產各種產品所花費的勞動是私人勞動。但是，一旦某商品受了別的商品的作用而處於等價形式的位置上，那麼生產該商品的私人勞動就轉化為社會勞動。例如，上衣對麻布是處於等價形式，即縫上衣的勞動就有了抽象人類勞動的意義。在這個關係中，因為它是抽象的人類勞動的化身，也就沒有和其它勞動相區別的特徵，因而直接是可以和麻布交換的。

經過上述對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的考察之後，馬克思就從簡單的價值形式開始，例如 20 碼麻布=1 件上衣。通過「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發展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後，當貴金屬商品被其他一切商品當作等價物，從而被排擠出商品的行列，並取得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地位時，一般價值形式就過渡到「貨幣形式」。「等價形式同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會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特殊商品成了貨幣商品，或者執行貨幣的職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會職能，從而成了它的社會獨占權。」<sup>65</sup>「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sup>66</sup>說明了為什麼金和銀等貴金屬的自然屬性適合作為貨幣，從而擔當一般等價物的職能：

一種物質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質的，才能成為價值的適當的表現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類勞動的化身。另一方面，因為價值量的差別純粹是量的差別，所以貨幣商品必須只能有純粹量的差別，就是說，必須能夠隨意分割，又能夠隨意把它的各部分合併起來。金和銀就天然具有這種屬性。<sup>67</sup>

因此，商品流通之所以必然導致商品二重化為商品與貨幣，原因就在於：

勞動是表現在一定產品中的私人勞動。可是，產品作為價值應該是

---

<sup>64</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73。

<sup>6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85。

<sup>66</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07。

<sup>67</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07~108。



社會勞動的化身，並且作為社會勞動的化身應該能夠由一種使用價值直接轉化為其他任何使用價值（勞動賴以直接表現的一定的使用價值，對勞動來說應該是無關緊要的，這樣，產品就能夠由使用價值的一種形式轉化為使用價值的另一種形式）。因此，**私人勞動**應該直接表現為它的對立面，即**社會勞動**；這種轉化了的勞動，作為私人勞動的直接對立面，是**抽象的一般勞動**，這種抽象的一般勞動因此也表現為某種一般等價物。個人勞動只有通過異化，才實際表現為它的對立面。但是，商品必須在它讓渡以前具有這種一般的表現。個人勞動必然表現為一般勞動，就是商品必然表現為貨幣。就這些貨幣當作尺度，當作商品價值的**價格**表現來說，商品得到了這種表現。但是商品只有實際轉化為貨幣，只有通過出賣，才作為交換價值得到自己的這種適當的表現。第一個轉化只是理論的過程，第二個轉化才是實際的過程。<sup>68</sup>

可見，「商品的**交換價值**在貨幣上的**獨立化**本身，是交換過程的產物，是商品中包含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以及商品中同樣包含的矛盾——一定的、特殊的私人勞動必然表現為它的對立面，表現為同一的、必要的、一般的並且在這種形式上是社會的勞動——發展的結果。」<sup>69</sup>「商品中包含的單個人的勞動轉化為**同一的社會勞動**，從而轉化為可以表現在所有使用價值上，可以同所有使用價值相交換的勞動——這種轉化，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中包含的這個問題的**質**的方面，李嘉圖沒有加以闡述。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必須表現為同一的社會勞動即貨幣，這種情況被李嘉圖忽視了。」<sup>70</sup>李嘉圖雖然正確地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是衡量它們的價值量的內在尺度。因為勞動是不同商品得以作為同質的東西，是它們

---

<sup>68</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頁 145~146。

<sup>69</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頁 140。

<sup>70</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頁 140~141。馬克思指出，對這一內容的「質」的考察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沒有研究過的，尤其是李嘉圖。他把注意力都停留在「量」的考察上，即兩種商品的交換比例，使得他無法也不可能理解隨著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個人勞動也必然會轉化為同一的社會勞動，即貨幣這一範疇。詳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頁 140、147、149。

的統一體，它們的實體以及它們的價值的內在基礎。然而他卻沒有研究「勞動在什麼樣的一定形式上才是這種東西。」<sup>71</sup>

李嘉圖之所以沒有能夠得出貨幣是社會勞動藉以表現的特殊形式，是因為他沒有「勞動二重性」這一概念。<sup>72</sup>針對這一點，馬克思指出：

李嘉圖對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和表現在交換價值上的勞動沒有加以應有的區別。作為價值基礎的勞動不是特殊的勞動，不是具有特殊的質的勞動。在李嘉圖那裡，到處都把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同表現在交換價值上的勞動混淆起來。誠然，後一種形式的勞動只是以抽象形式表現的前一種形式的勞動。<sup>73</sup>

由此可知，貨幣決不是像薩伊與李嘉圖所認為的，僅僅是在兩種商品交易完成後轉瞬即逝的流通工具。相反地，馬克思認為貨幣的出現是與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的過程分不開的：

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物，在交換過程中，各種不同的勞動產品事實上彼此等同，從而事實上轉化為商品。交換的擴大和加深的歷史過程，使商品本性中潛伏著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發展起來。為了交易，需要這一對立在外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商品價值有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個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於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而最終取得這個形式為止。可見，隨著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轉化為貨幣。<sup>74</sup>

如前所述，貨幣形式不但是商品形式的完成型態，同時也是個人勞動取得社

---

<sup>71</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頁148。

<sup>72</sup> 馬克思曾經自豪地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55。

<sup>73</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頁149。

<sup>74</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105。

會性質的表現形式，因而貨幣形式本身就是社會勞動的體化物。在介紹完馬克思對貨幣起源的分析以後，現在本文將接著考察貨幣與經濟危機的關係。

商品的交換過程，從而也就是商品形態的變化： $W-G-W$ （商品—貨幣—商品）這一過程通過貨幣的中介使這個過程分為：賣（ $W-G$ ）和買（ $G-W$ ）。「商品轉化為貨幣，同時就是貨幣轉化為商品。這一個過程是兩方面的：從商品所有者這一極看，是賣；從貨幣所有者這另一極看，是買。或者說，賣就是買， $W-G$  同時就是  $G-W$ 。」<sup>75</sup>因此，「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相反的運動階段組成一個迴圈：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拋棄，商品形式的復歸。」<sup>76</sup>從而「一個商品的總形態變化，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上，包含四個極和三個登場人物。」因而與直接的、僅僅存在買賣雙方之間的物物交換不同：

組成一個商品的迴圈的兩個形態變化，同時是其他兩個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態變化。同一個商品(麻布)開始它自己的形態變化的系列，又結束另一個商品(小麥)的總形態變化。商品在它的第一個轉化中，即在出賣時，一身兼有這兩種作用。而當它作為金蛹結束自己的生涯的時候，它同時又結束第三個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可見，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所形成的迴圈，同其他商品的迴圈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

不同於直接的產品交換，流通過程在使用價值即商品轉手之後並沒有結束：

貨幣並不因為它最終從一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中退出來而消失。它不斷地沉澱在商品空出來的流通位置上。例如，在麻布的總形態變化即麻布—貨幣—聖經中，先是麻布退出流通，貨幣補上它的位置，然後是聖經退出流通，貨幣又補上聖經的位置。一個商品由另一個商品代替，而貨幣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流通不斷地把貨幣像汗一樣滲出來。<sup>77</sup>

---

<sup>7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27。

<sup>76</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31。

<sup>77</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32。

可見，在這個過程中，貨幣並不像薩伊所說「只一瞬間起作用」<sup>78</sup>，相反地，商品不斷地退出流通並且被將它當作使用價值的買者消費掉，而貨幣卻仍舊在流通過程中繼續它的旅程。

在進行物物交換的時候，就生產者方面而言，生產產品的主要是爲了滿足他自己的需求。作爲商品拿來交換的是超過他自身需求的剩餘產品，即使交換不成，對生產者本身也沒有重大影響。但在商品生產的情況下，商品轉化爲貨幣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條件。如果商品賣不出去，就會發生危機。因此，商品生產與直接物物交換不同之處在於：

**商品**（個人勞動的特殊產品）轉化爲它的對立物**貨幣**，即轉化爲抽象一般的社會勞動的困難，在於**貨幣**不是作爲個人勞動的特殊產品出現，在於已經賣掉了商品而現在持有貨幣形式的商品的人並不是非要立刻重新買進、重新把貨幣轉化爲個人勞動的特殊產品不可。在物物交換中不存在這種對立。在那裡不是買者就不能是賣者，不是賣者就不能是買者。賣者一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價值，一的困難僅僅是由於買者可以輕易地推遲貨幣再轉化爲商品的時間而產生的。商品轉化爲貨幣即出賣商品的這種困難，僅僅是由於商品必須轉化爲貨幣，貨幣卻不立即必須轉化爲商品，因此**賣和買**可能彼此脫離而產生的。我們說過，這個**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著這樣的可能性：相互聯繫和不可分離的因素彼此脫離，因此它們的統一要通過強制的方法實現，它們的相互聯繫要通過強加在它們的彼此獨立性上的暴力來完成。**危機**無非是生產過程中已經彼此獨立的階段強制地實現統一。<sup>79</sup>

因此，危機可以歸結爲兩種形式：「危機的第一種形式是商品的形態變化本身，即買和賣的分離。危機的第二種形式是貨幣作爲支付手段的職能，這裡貨幣在兩個不同的、彼此分開的時刻執行兩種不同的職能。」<sup>80</sup>從而危機的這兩種形

---

<sup>78</sup> Jean Baptiste Say 著，**政治經濟學概論**，頁 144。

<sup>79</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581。

<sup>80</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582。

式就會表現在：

如果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危機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買和賣的分離中。如果貨幣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貨幣在兩個不同的時刻分別起**價值尺度**和**價值實現**的作用，一危機的可能性就包含在這兩個時刻的分離中。如果價值在這兩個時刻之間有了變動，如果商品在它賣出的時刻的價值低於它以前在貨幣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因而也執行相互債務尺度的職能的時刻的價值，那麼，用**出賣商品的進款**就不能清償債務，因而，再往上推，以這筆債務為轉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結算。即使商品的價值沒有變動，只要商品在**一定時期內**不能賣出，單單由於這一筆債務，貨幣就不能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因為貨幣必須在**一定的、事先規定的期限內**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但是，因為同一筆貨幣是對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債務執行這種職能，所以**無力支付的情況**就不止在一點上而是在許多點上出現，由此就發生**危機**。<sup>81</sup>

但這還不過是危機最抽象的形式（危機形式上的可能性），因為使危機的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原因，並不包含在這個形式本身當中：

有簡單的貨幣流通，甚至有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流通——這兩者早在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很久就出現了，卻沒有引起危機——而沒有危機是可能的，也是現實的。因此，單單用這些形式不能說明，為什麼這些形式會轉向其危機的方面，為什麼這些形式潛在地包含著的矛盾會實際地作為矛盾表現出來。<sup>82</sup>

所以危機的現實性即危機在現實中表現出來的原因，只有考察「資本的再生產過程」的時候才能找到。單是考察資本的生產過程還不能使現實的危機的原因表現出來。雖然生產過程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占有，但是這個過程本身並不包

---

<sup>81</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587。

<sup>82</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584~585。

含剩餘價值的實現，因而危機的現實性還不能獲得它得以產生的必要條件。這個條件只有在本身同時就是再生產過程的流通過程才能顯現出來<sup>83</sup>，因為資本的總流通過程或總再生產過程，就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的流通過程的統一。因此，現實的危機就可能出現在資本的生產過程與資本的流通過程彼此之間相互轉化<sup>84</sup>的運動當中：

**危機**可能發生在：第一，[貨幣]再轉化為生產資本的時候；第二，由於生產資本的要素特別是原料的價值變動，如棉花收成減少，因而它的價值增加。我們這裡所涉及的還不是價格，而是價值。

**第一個因素。貨幣再轉化為資本。**假定這是生產或再生產的一定階段。這裡，可以把固定資本看成既定的、不變的，它不加入價值形成過程。既然原料的再生產不僅取決於花費在其中的勞動，而且取決於這一勞動的同自然條件有關的生產率，那麼，產品量—甚至同一勞動量生產

---

<sup>83</sup> 馬克思指出，在考察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時，「我們應當分析的是  $W'-G(g)-W(w)\cdots P\cdots W'$ （筆者按：這是商品資本的循環公式。其中  $W$  指商品； $G$  指貨幣； $g$  指由剩餘價值轉化的貨幣形式； $w$  指由剩餘價值轉化的商品形式； $P$  指生產領域）。這個流通公式，在這裡，消費必然會起作用；因為起點  $W'=W+w$ ，即商品資本，既包含不變資本價值和可變資本價值，也包含剩餘價值。所以，它的運動既包括生產消費，也包括個人消費。在  $G-W\cdots P\cdots W'-G$  循環（筆者按：貨幣資本的循環）和  $P\cdots W'-G'-W\cdots P$  循環（筆者按：生產資本的循環）中，資本的運動是起點和終點：這一運動自然也包括消費，因為商品，即產品，必須出售。但是，只要商品已經出售，這個商品以後變成什麼，對單個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關係的。相反地，在  $W'\cdots W'$ ，運動中，正是要通過說明總產品  $W'$  的每一價值部分會變成什麼，才能認識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在這裡，總的再生產過程既包括資本本身的再生產過程，也包括以流通為媒介的消費過程。」Karl Marx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35~436。

<sup>84</sup> 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分析指出，資本的流通過程可以分為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這三種循環公式。「任何一個單個產業資本都是同時處在所有這三種循環中。這三種循環，三種資本形態的這些再生產形式，是連續地並列進行的。...總循環是它的三個形式的現實的統一。...資本的循環過程是不斷的中斷，是離開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是拋棄一種形式，存在於另一種形式；其中每一個階段不僅以另一個階段為條件，而且同時排斥另一個階段。」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117~118。

的產品量一就可能減少（在歉收時）。於是原料的價值增加，原料的量則減少。為了以原有規模繼續生產，貨幣必須按一定比例再轉化為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而現在這個比例被破壞了。用於原料的部分必須增加，剩下用於勞動的部分就減少，因此就不能吸收和以前相同的勞動量。第一是物質上不可能，因為原料的量減少了；第二是因為產品價值中必須有比原來更大的一部分用於原料，因而只能有較小一部分轉化為可變資本。再生產不能按原有規模重新進行。一部分固定資本要閒置起來，一部分工人會被拋到街頭。利潤率會下降，因為不變資本的價值同可變資本相比增加了，使用的可變資本減少了。以利潤率和勞動剝削率不變為根據事先規定的固定提成—利息、地租—仍舊不變，有一部分不能支付。於是發生危機。勞動危機和資本危機。因此，這就是由於靠產品價值補償的一部分不變資本的價值提高而引起的再生產過程的破壞。其次，雖然利潤率下降，產品卻會漲價。如果這種產品作為生產資料加入其他生產領域，那麼這種產品的漲價會使其他領域的再生產遭到同樣的破壞。如果這種產品作為生活資料加入一般消費，那麼，它或者也加入工人的消費，或者不加入工人的消費。如果是前者，它的後果同後面要講的可變資本遭到破壞時產生的後果一樣。但是，在這種產品加入一般消費的情況下，由於這種產品漲價（如果這種產品的消費不減少），對其他產品的需求就會減少，因而其他產品就不能再轉化為相當於其價值的貨幣額，這樣，其他產品的再生產的另一方面—不是貨幣再轉化為生產資本，而是商品再轉化為貨幣—就會遭到破壞。無論如何，我們所考察的這個生產部門的利潤量和工資量會減少，從而其他生產部門出賣商品所得的一部分必要收入也會減少。

但是，即使不受收成的影響，或者說，即使不受提供這種原料的勞動的受自然因素制約的生產率的影響，這種原料不足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就是說，如果某個生產部門花費在機器等等上的那部分剩餘價值，那部分追加資本過多，那麼，雖然按原來的生產規模原料是夠的，但按新的生產規模就不夠了。因此，這種情況是由於追加資本不按比例地轉化為資本的不同要素而產生的。這是固定資本生產過剩的情況，它所產生的現象正好同第一種情況[即原料歉收時]所產生的現象完全一樣。

或者，它們[危機]是以固定資本的生產過剩，因而，是以流動資本的相對的生產不足為基礎的。

因為**固定資本**同**流動資本**一樣，都是由商品組成的，所以，那些否認**商品生產過剩**而同時又承認**固定資本生產過剩**的經濟學家們的立場是最可笑不過的了。<sup>85</sup>

綜上所述，馬克思認為，只要構成資本的再生產過程的資本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的流通過程之間的相互轉化出現了困難，不論它是發生在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生產資料時，或者是發生在商品資本要轉化為貨幣的過程即商品出售時，都會引起現實的危機。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只要某一生產部門發生危機，不論危機是由於該部門商品的生產過剩或者生產不足所引起的，都會通過流通過程使危機蔓延至其他相關的生產部門，造成它們發生相對的生產不足或生產過剩。危機一旦發生在生產主要消費品的部門，則個別部門的危機就可能引起普遍的危機。

在介紹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看法以後，現在就回過頭來看看他如何以此來反駁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關於資本主義不會發生經濟危機的論點。

首先，李嘉圖跟著薩伊說：「產品總是要用產品或勞務購買的，貨幣只是實現交換的媒介。」<sup>86</sup>關於這一論點，馬克思反駁道：

第一，包含著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的**商品**變成了單純的產品（使用價值），因而商品交換變成了單純的產品的物物交換，僅僅是使用價值的物物交換。這就不僅是退回到資本主義生產以前，而且甚至退回到簡單商品生產以前去了；並且通過否定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條件，即產品必須是商品，因而必須表現為貨幣並完成形態變化過程，來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最複雜的現象——世界市場危機。不說雇傭勞動，卻說

---

<sup>85</sup> []內的文字為編者所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588~591。關於資本過剩與商品過剩的區別，馬克思以為，在李嘉圖本人的看法中，商品不可能過剩和資本不可能過剩是同一回事。然而他的門徒們卻用資本過剩來解釋經濟危機的現象，而否認商品的生產過剩。也就是說一方面承認一種形式的生產過剩，另一方面卻否認另一種形式的生產過剩。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566~567。

<sup>86</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248。



「服務」<sup>87</sup>，在「服務」這個詞裡，雇傭勞動及其使用的特殊規定性——就是增大它所交換的商品的價值，創造剩餘價值，一又被拋棄了，因而貨幣和商品藉以轉化為資本的那種特殊關係也被拋棄了。「服務」是一種僅僅作為**使用價值**來理解的勞動（這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是次要的事情），完全像「產品」這個詞掩蓋了**商品**的本質和商品中包含的矛盾一樣。於是**貨幣**也就前後一貫地被看作僅僅是產品交換的媒介，而不是被看作必然表現為交換價值，即表現為一般社會勞動的**商品**的本質的、必然的存在形式。因為這樣把商品變為單純的使用價值（產品）會抹殺交換價值的本質，所以，**貨幣**作為**商品**的本質的、在形態變化過程中**獨立**於商品最初形式的形態，也就同樣輕而易舉地可能被否定，確切地說，必然被否定。

因此，這裡論證不可能有危機的辦法就是，忘記或者否定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前提——產品作為**商品**的存在，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由此產生的在商品交換中的分離因素，最後，貨幣或商品對雇傭勞動的關係。<sup>88</sup>

李嘉圖又說：

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出賣，任何人出賣都是為了購買對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於未來生產的某種別的商品。所以，一個人從事生產時，他不成為自己產品（goods）的消費者，就必然成為他人產品的買者和消費者。不能設想，他會長期不了解為了達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獲得別的產品，究竟生產什麼商品對他最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繼續不斷地（continually）生產沒有需求的商品。<sup>89</sup>

---

<sup>87</sup> 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中，李嘉圖這句話譯作：「產品總是用產品或服務購買的；貨幣只是進行交換的媒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571。

<sup>88</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571~572。

<sup>89</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對於這段話，馬克思反駁指出：

首先，沒有一個資本家是為了消費自己的產品而進行生產的。當我們說到資本主義生產時，即使有人把他的產品的某些部分再用於生產消費，我們也有充分理由說：「任何人從事生產都不是為了消費自己的產品。」但是，李嘉圖說的是私人消費。以前，李嘉圖忘記了產品就是商品。現在，他連社會分工也忘記了。在人們為自己而生產的社會條件下，確實沒有危機，但是也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我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古代人在他們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生產中見過什麼危機，雖然在古人中也有個別生產者遭到破產。在二者擇一的說法[「為了消費或出賣」]中，前一部分是荒謬的。後一部分也是荒謬的。一個人已經進行了生產，是出賣還是不出賣，[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他是非出賣不可。在危機中出現的正是這樣的情況，他賣不出去或者只能低於費用價格出賣，甚至不得不乾脆虧本出賣。因此，說他把產品生產出來是為了出賣，這對他、對我們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問題正是在於：要弄清楚究竟是什麼東西阻礙他這個善良願望的實現。

其次：

「任何人出賣都是為了購買對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於未來生產的某種別的商品。」

把資產階級關係描繪得多麼美好呵！李嘉圖甚至忘記了，有人可能是為了支付而出賣，忘記了這種被迫的出賣在危機中起著很重要的作

---

573。在斯拉法編的**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中譯本裡，這段話譯作：「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銷售；銷售則都是為了購買對於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於未來生產的某種其他商品。所以一個人從事生產時，他要不是成為自己商品的消費者，就必然會成為他人商品的購買者和消費者。我們不能認為他會總不了解為了達到自己所具有的目的——佔有他種商品——生產什麼商品對他最為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總是生產沒有需求的商品。」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247。

用。資本家在出賣時的直接目的是把他的商品，確切些說，是把他的商品資本，再轉化成為**貨幣資本**，從而**實現他的利潤**。消費—收入—決不是這個過程的主導因素，對於僅僅為了把商品變成生活資料而出賣**商品**的人來說，消費確實是主導因素。但這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收入[消費]是作為結果，而不是作為起決定作用的目的出現的。每一個人出賣，首先是為了出賣，就是說，為了把商品變成貨幣。

在發生危機的時候，一個人只要把商品**賣出去**，他就會感到很滿意了，至於買進，他暫時不會去考慮。當然，要使實現了的價值能再作為資本發生作用，這個價值就必須通過再生產過程，也就是必須再同勞動和商品進行交換。但是，危機恰恰就是再生產過程破壞和中斷的時刻。而這種破壞是不能用在不發生危機的時候它並不存在這個事實來解釋的。毫無疑問，誰也不會「繼續不斷地生產沒有需求的商品」，但是誰都沒有作過這種荒謬的假設。並且，這樣的假設同問題也毫無關係。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首先不是「獲得別的產品」，而是佔有價值、貨幣、抽象財富。<sup>90</sup>

其次，薩伊在反駁西斯蒙第認為由於生產過剩，使得英國商品充斥國外市場時指出：

這些市場所發生的存貨充斥現象，只不過證明這些充斥了英國工業產品的國家自己生產過少而已。如果巴西生產有足夠的產品以購買英國進口貨，英國貨便不至充斥巴西市場。又如果英國讓美國貨物進口，英國產品在美國便能更加暢銷。...

讀者不要認為我的主張是：不可能發生一種產品比其他產品生產得過多的現象。我不過在這裡主張：最有助於促進一種產品的需求，無過於另一種產品的供給。如果巴西產品豐富，運到巴西的英國工業品便會

---

<sup>90</sup> []內的文字為編者所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573~575。

很快地購買一空，而不至充斥市面。<sup>91</sup>

對於薩伊這一論點，馬克思指出：

李嘉圖也承認個別商品有可能充斥市場。**不可能的**只是同時的普遍的市場商品充斥。因此，不否認任何特殊生產領域有生產過剩的可能性。他認為，[普遍的]生產過剩和由此而來的普遍的市場商品充斥所以不可能，是因為這種現象不可能在一切生產領域**同時發生**。「普遍的市場商品充斥」這個詞總是應該有保留地來理解，因為在發生普遍生產過剩的時候，有些領域的生產過剩始終只是主要交易品生產過剩的**結果、後果**，始終只是**相對的**，只是因為其他領域存在著生產過剩才成為生產過剩。

辯護論恰好把這一點顛倒過來了。照這些辯護論者的說法，只出現主動的生產過剩的那些主要交易品（一般說這是只能大規模地和用工廠方式進行生產的物品，在農業上也一樣），它們的生產過剩之所以成為生產過剩，僅僅因為會出現相對的，或者說，被動的生產過剩的那些物品存在著生產過剩。按照這種看法，生產過剩之所以存在，僅僅因為生產過剩不是普遍的。生產過剩的**相對性**，即一些領域中現實的生產過剩引起另一些領域的生產過剩這個事實，被表述如下：**普遍的**生產過剩並不存在，因為，如果生產過剩是普遍的，一切生產領域相互之間就會保持同樣的比例；就是說，**普遍的**生產過剩等於按比例生產，而按比例生產是排除生產過剩的。據說，這是反對普遍生產過剩的論據。就是說，因為絕對意義上的**普遍生產過剩**並不是生產過剩，而只是一切生產領域的生產力的發展都超過了通常的水準，所以，據說，**現實的生產過剩**（它恰恰不是這種不存在的、自我消除的生產過剩）**並不存在**。其實，只是因為現實的生產過剩不是這樣的生產過剩，所以它是存在的。<sup>92</sup>

---

<sup>91</sup> Jean Baptiste Say 著，**政治經濟學概論**，頁 146。

<sup>92</sup> []內的文字為編者所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604~605。

因此，上述這種說法應用在國際貿易中，正如薩伊所做的那樣：把一國的生產過剩，解釋為另一國的生產不足，以此否認普遍的生產過剩不可能發生。對此，馬克思反駁指出：

換句話說，這無非是意味著：如果需求和供給彼此相符，如果資本按這樣的比例在一切生產領域之間進行分配，以致一種物品的生產就包含著另一種物品的消費，因而也就包含著它自己的消費，那就不會發生生產過剩。如果不發生生產過剩，那生產過剩就不會發生。但是，因為在一定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只能在某些領域無限制地自由發展，所以，如果資本主義生產必須在一切領域同時地、均勻地發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資本主義生產。因為在上述某些領域生產過剩絕對存在，所以在沒有[絕對的]生產過剩的那些領域，也就相對地存在著生產過剩。

總之，這種用一方面的生產不足來說明另一方面的生產過剩的觀點無非是說：如果生產按比例進行，那就不會發生生產過剩。如果需求和供給彼此相符，也就不會發生生產過剩。如果一切領域具有進行並擴大資本主義生產的同樣的可能性，如分工、機器、向遙遠的市場輸出、大規模生產等等，如果互相貿易的一切國家具有進行生產（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為補充的生產）的同樣的能力，也就不會有生產過剩。因此，如果發生生產過剩，那是因為所有這些虔誠的願望沒有實現。或者更抽象地說：如果到處都均勻地發生生產過剩，那就不會在一處發生生產過剩。但是，現在資本沒有大到足以使生產過剩帶有這樣普遍的性質，因此就只會發生局部的生產過剩。<sup>93</sup>

再次，李嘉圖接受了薩伊的「生產會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論點，認為需求只受生產的限制，因為可供消費的東西不會多於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因為人類的慾望是無限的，從而生產商品所使用的資本只要還能提供利潤，那麼也是沒有限制的。因此，在李嘉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不可能發生普遍的生產過剩。馬克思同意李嘉圖關於「生產只受資本限制」的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是不考慮消費

---

<sup>93</sup> []內的文字為編者所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607~608。

的現有界限的，生產只受資本本身的限制。而這一點確實是這種生產方式的特點。」<sup>94</sup>雖然生產確實是消費的界限，但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決不是像李嘉圖所說的那樣：「生產多少就能夠或者必須消費掉多少。」針對這一點，馬克思指出：

**生產過剩**這個詞本身會引起誤解。只要社會上相當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們最直接的需要還沒有得到滿足，自然絕對談不上**產品的生產過剩**（在產品量超過對產品的需要這個意義上講）。相反，應當說，在這個意義上，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經常是**生產不足**。生產的界限是資本家的利潤，決不是生產者（筆者按：生產者在這裡指的是工人）的需要。但是，**產品的生產過剩**和**商品的生產過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李嘉圖認為，**商品**形式對於產品是無關緊要的，其次，**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於物物交換，交換價值在這裡只是物質變換的轉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貨幣只是形式上的流通手段；這一切實際上都是來源於他的這樣一個前提：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是絕對的生產方式，也就是沒有更確切的特殊規定的生產方式，因此，這種生產方式的一切規定都只是某種形式上的東西。因此，李嘉圖也就不能承認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包含著生產力自由發展的界限——在危機中，特別是在作為危機的基本現象的**生產過剩**中暴露出來的界限。

李嘉圖從他引用、贊同並因而復述的斯密論點中看到，追求各種各樣使用價值的無限「欲望」，總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狀態的基礎上得到滿足，在這種社會狀態中，廣大的生產者仍然或多或少只限於獲得「食品」和「必需品」，因此，只要財富超出必需品的範圍，絕大多數生產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於財富的消費之外。<sup>95</sup>

由此可知，馬克思以為，「構成現代生產過剩的基礎的，正是生產力的不可遏止的發展和由此產生的大規模的生產，這種大規模的生產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進

---

<sup>94</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594。

<sup>95</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602~603。

行的：一方面，廣大的生產者的消費只限於必需品的範圍，另一方面，資本家的利潤成爲生產的界限。」<sup>96</sup>因此，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生產過剩」應該這樣來理解：

它是**以資本的一般生產規律**爲條件：按照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資本剝削最大量勞動的可能性）進行生產，而不考慮市場的現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現有界限。而這是通過再生產和積累的不斷擴大，因而也通過收入不斷再轉化爲資本來進行的，另一方面，廣大生產者的需求卻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準，而且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必須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準。<sup>97</sup>

最後，在反駁了古典經濟學家的上述論點以後，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這些用以反對經濟危機的錯誤觀點背後的思想根源：

李嘉圖和其他人對生產過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對意見的基礎是，他們把資產階級生產或者看作不存在買和賣的區別而實行直接的物物交換的生產方式，或者看作社會的生產，在這種生產中，社會好像按照計畫，根據爲滿足社會的各種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規模，來分配它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力，因此每個生產領域都能分到爲滿足有關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會資本。這種虛構，一般說來，是由於不懂得資產階級生產這一特殊形式而產生的，而所以不懂又是由於一種成見，認爲資產階級生產就是一般生產。正像一個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這種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認爲除此以外都是邪教一樣。<sup>98</sup>

綜上所述，由於古典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作絕對的或者說永恆

---

<sup>96</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603~604。

<sup>97</sup> 粗體字乃筆者所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610~611。

<sup>98</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604。

的生產方式。因此，他們自然也就從物物交換的角度來看待商品流通，從而把商品生產當作與產品生產無異的生產方式。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以為「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sup>99</sup>與之相反，馬克思認為，以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別於過去一切人類歷史上的曾經出現過的生產方式。雖然勞動生產得以進行的條件不外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相結合，但這些條件的結合方式與形式，在人類歷史的各個時期卻不盡相同。因此，即使商品與貨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以前，早就已經存在了，但卻沒有引起生產過剩的瘟疫。為什麼產品的生產過剩對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而言是利益，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它卻成了危機呢？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以前的社會裡，純粹的商品生產還不占統治地位。因此，即使商品的二重化本身隱含著的引起經濟危機的因素，但它對以自給自足為主的社會生產所造成的影響極其有限。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的範圍擴大，從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機會也相應地增長起來。

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是，一方面，資本總是不斷地追求提高勞動生產力，但它這麼做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提供更多產品以供消費，而是為了它自身的價值增殖；另一方面，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決定的分配方式同樣受到資本增殖的限制，使得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被壓抑在一定的範圍內。因此，即使人類的慾望如李嘉圖所指出的那樣是無限的，但是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人的慾望卻總是受限於他們有限的工資而無法達到真正的滿足。因此，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真正的根源是來自於，與商品生產相適應的、構成它自身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

---

<sup>99</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23。



## 第三章 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分流與評析

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分析大致上可區分為三個流派：消費不足論、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與利潤率下降論。本章的第一節，筆者將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發展史做一個概要性的介紹，這有助於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分流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關係。第二節則要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三種流派中，分別論述幾位主要理論支持者的基本論點，藉此了解這三種流派各自是如何解讀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有鑑於前述三種流派都能夠各自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中找到立論的依據。故筆者將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分析，來檢證這三種流派各自援引的根據，通過這個方式將有助於釐清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究竟所指為何。

###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史的概述

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總是將經濟危機與革命運動聯繫在一起，他們都試圖通過經濟危機來論證資本主義崩潰的必然性與否。而 1940 年以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討論，已經不再以說明資本主義是否會崩潰為目的，而主要是為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尋找原因。故筆者將按理論典範上的不同，以 1940 年為界限把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分為早期和現代兩個時期。

1895 年恩格斯逝世後，原來作為第二國際的正統理論的消費不足論受到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挑戰。伯恩斯坦在其 1899 年所著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Evolutionary Socialism*）第一版序中，就駁斥當時社會民主黨內部瀰漫著一股「資本主義崩潰論」的看法：

我對於期待中的資產階級社會崩潰就要到來的見解，以及社會民主黨依照對於這種即將到來的社會大災變的期待而使自己的戰術從屬起來的見解，不能不表示反對，這一點我是要堅持到底的。

贊成這種大災變說的人，原來是以「共產黨宣言」的論斷為依據，而那個論斷，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都錯誤了。<sup>100</sup>

伯恩斯坦從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事實例如，資本家人數不是減少而是增加；工人的收入不是減少而是增加；經濟危機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完善而趨緩等等，藉此否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論述。1898~1899年，盧森堡發表了兩組論文反駁伯恩斯坦，這兩組論文後來收錄在**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一書。文中盧森堡指責伯恩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走向一個普遍的經濟危機。但是，這樣一來，他就不僅否定了資本主義滅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了資本主義滅亡本身。」<sup>101</sup>「如果人們同意伯恩施（斯）坦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走向自己的滅亡，那麼，社會主義也就不再是客觀上必然的事情了。」<sup>102</sup>伯恩斯坦這一挑戰的重要性在於，他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與崩潰論結合起來。並且通過盧森堡的批判，使得兩者之間的關係更加確立起來，這對早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非常深遠。

1901年俄國經濟學家杜岡所著的**英國商業危機的理論和歷史的研究**(*Studies o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Commercial Crisis in England*) 德文版出版後，引發對第二國際正統的消費不足論的另一次挑戰。杜岡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提出的再生產的公式，指出只要擴大再生產所增加的需求與爲了擴大再生產而犧牲的消費需求減少的比例相等，那麼就不會引起危機。亦即，杜岡認為只要社會生產的比例適當，無論社會消費量如何因此減少，擴大的再生產都會爲自己創造新的需求，所以不會出現消費不足的情況。從這個角度出發，對杜岡而言，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不過是社會生產的比例失調與恢復的週期性運動，而非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杜岡從社會生產的比例失調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引發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第一次分流。

面對杜岡的挑戰，第二國際內部也出現了正反兩面的反應。1902年，考茨基在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發表的「危機理論」一文中，再次重申了消費

---

<sup>100</sup> Eduard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trans. by Edith C. Harve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1), p.xxiv.

<sup>101</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盧森堡文選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76。

<sup>102</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盧森堡文選上卷**，頁77。

不足的論點：

資本家和被他們剝削的工人，隨著前者的財富和後者的人數的增多，提供了一個雖然不斷增長的市場，但是這個市場並不像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增長得那樣快，它對於資本主義大工業創造的消費資料並不夠用。資本主義大工業必須在自己的領域外，在還沒有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的行業中尋找補充的市場，它找到了這個市場，並且也日益擴大了這個市場。但是，擴大得不夠迅速，因為這個補充市場沒有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靈活性和擴張能力。只要資本主義生產變成了發達的大工業，...它就有可能這樣飛越地發展，即在短期內超過任何市場的擴大。因此，每一個隨著市場的顯著擴大出現的繁榮時期，從一開始就被決定是短暫的，危機是它的必然結局。<sup>103</sup>

考茨基認為杜岡否認生產和消費之間存在矛盾的觀點是一種「怪論」。他指出，「危機恰恰是由於資本家的出發點一再與社會的基本規律相矛盾而發生。不管資本家怎樣地把人等同於機器，社會仍然是人的社會，決不會成為機器的社會，社會關係總仍然是人與人的關係，決不會成為人與機器的關係...生產現在和將來都是為人的消費進行生產的。」<sup>104</sup>前面提到，杜岡認為經濟危機只是週期性的比例失調與恢復的運動。因此，考茨基在該文中，也重新分析了經濟危機的性質是否改變的問題。他指出：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它不能超越的界限。這樣的時期必然來到而且也許已經很近了；從這時起世界市場在某個時候只是暫時擴大得比社會生產力快的情況就不可能出現，那時一切工業國家都存在長期的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生產的進程在這一階段也還可能長期蕭條。<sup>105</sup>

由此，考茨基認為，這種長期蕭條的趨勢是杜岡的週期性比例失調論無法解

---

<sup>103</sup> 轉引自：劉明遠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和週期理論的結構與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49~150。

<sup>104</sup> 轉引自：楊健生著，**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頁84。

<sup>105</sup> 轉引自：楊健生著，**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頁85。

釋的，只有從消費不足的觀點才能分析這一現象。

希法亭在 1910 年出版的**金融資本**一書中，則贊同杜岡的生產部門比例失調的論點，而反對以商品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來解釋經濟危機：

一般說來，「商品生產過剩的說法」和「消費不足」的說法一樣，本身並不能說明什麼。嚴格地說，人們只能在生理學的意義上談消費不足。而這種說法在經濟學中沒有意義，在經濟學中只能說社會所消費的少於它所生產的。如果生產完全以正常的比例進行，那我們便想像不出消費不足怎樣才能發生。因為總商品等於不變資本加可變資本加剩餘價值 ( $c+v+m$ )， $v$  和  $m$  被消費掉，被消耗掉的不變資本要素必須得到補償，所以生產可以無限擴大而不會導致商品生產過剩，即不會導致生產出來的商品（這裡，只考慮使用價值）即物品超過所能消費的數量。

狹小的消費基礎僅僅是危機的一個一般條件，而危機根本不能由「消費不足」的論斷加以說明。危機的週期性危機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說明，因為週期性根本不能由某種經常的現象來說明。<sup>106</sup>

另外，盧森堡同樣圍繞著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來分析經濟危機問題。她認為對資本主義生產而言，單靠兩部類的比例正確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對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須相應地增加。<sup>107</sup>她以為剩餘價值不可能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來實現，而必須依靠「第三者」來實現。而這個「第三者」則要到資本主義社會以外，即非資本主義社會中去尋找。<sup>108</sup>如此一來，盧森堡就從消費不足的觀點，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兩者扣在一起。

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發展的尾聲階段，格羅斯曼在他 1929 年出版的**資本主義體系的積累規律與崩潰**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

<sup>106</sup> Rudolf Hilferding 著，福民等譯，**金融資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70~271。

<sup>107</sup>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by Agnes Schwarzschi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104.

<sup>108</sup>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330~332.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一書中，以公式證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所提出的利潤率下降的規律。格羅斯曼認為，資本主義特有的驅動力是價值增殖的過程，而非生產的技術過程（筆者按：例如，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間配置的比例）。產業後備軍即失業工人的產生不是因為他們被新機器或新技術取代所致，相反地，這是因為在資本積累的一定階段上，利潤的生產不足以添購新的生產設備來增加就業機會所致。<sup>109</sup>在格羅斯曼看來，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不僅是崩潰論，也是危機理論。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地提高，但利潤的生產卻不足以維持資本積累的進行，故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就包含著崩潰的趨勢；而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在一定階段上又引起生產的中斷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然而經濟危機一方面是資本積累不平衡的表現，另一方面它又是資本積累恢復平衡的手段。作為後者，它通過一系列起反作用力量的因素來抵銷利潤率下降的力道。從利潤率下降的角度來分析經濟危機，引起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第二次分流。至此，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中的三大主要流派便大抵形成了。

1942年，斯威齊發表的**資本主義發展論**（*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一書開啓了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大門，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現代時期的開端。他將經濟危機區分為「與利潤率下降趨勢相聯繫的危機」與「實現的危機」兩種。

斯威齊認為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引起利潤率下降的原因，除了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以外，可以是工資的提高，也可以是剩餘價值實現的困難。因此，難以斷定馬克思心目中究竟所指的是哪一種利潤率下降。<sup>110</sup>接著，在以資本積累的發展與產業後備軍之間的關係來分析利潤率下降論後，斯威齊指出這一理論實際上是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接受的經濟週期概念。它的因果關係是，「由積累率到就業量，由就業量到工資水平，又由工資水平到利潤率。利潤率下降至規範值數域以下，這就扼殺了積累並引發一場危機，危機又轉為蕭條，最後，蕭條重新創造出有利於積累率加速的種種條件。」<sup>111</sup>斯威齊認為這樣的危機理論不可能是馬克思本人會接受的，從而否定了以利潤率下降來解釋經濟危機的可行性。

---

<sup>109</sup> Henryk Grossmann,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trans. by Jairus Banaji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p.80.

<sup>110</sup> Paul Sweezy 著，陳觀烈、秦亞男譯，**資本主義發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167。

<sup>111</sup> 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174。

斯威齊將實現的危機分為「比例失調引起的危機」與「消費不足引起的危機」。他認為比例失調論的內在價值不高，且必須被貶低到次要的地位。<sup>112</sup>接著，通過引用考茨基、盧森堡、布哈林等人對杜岡理論的批判，將比例失調論也排除出去。因此，就斯威齊看來，就只剩下消費不足論足以擔當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大任。但他的目的並不是要建構一個獨創的理論，也不是要修正馬克思的理論，而只是要補充馬克思的消費不足論。

斯威齊認為「消費不足論的真正任務，是要論證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一種趨勢，即消費品生產能力的擴大快於消費品需求的增長。」<sup>113</sup>至於消費不足的趨勢可能以兩種方式之一出現，或者是商品生產過剩而發生實現的困難，或者是為了避免生產過剩而使一部份生產能力閒置。如果是前者則消費不足將會表現為一場經濟危機，若是後者則這個趨勢就會表現為生產的停滯。他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資本家和工人個人消費的部分雖然一直在增加。但是它在剩餘價值當中占的比重，相較於生產資料來說是越來越低，亦即消費增長率相對於生產資料增長率而言是下降的。但是如果假定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使用價值，那麼由於受到生產技術的影響，消費品產量增長率與生產資料增長率之比始終不變。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消費的增長本來就有落後於消費品產量的趨勢，這個趨勢可以是危機，也可以是停滯，或兩者兼有。<sup>114</sup>

另外，斯威齊也研究了能夠抵銷消費不足趨勢的各種力量<sup>115</sup>，並且隨後在1966年與巴蘭（Paul Baran）合著的**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一書中，研究壟斷資本如何通過各種抵銷的力量，來挽救由於需求不足而生產的經濟停滯。

吉爾曼（Joseph Gillman）則是繼斯威齊之後，美國消費不足危機理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1957年，他出版了**利潤率的下降**（*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Marx's Law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ism*）一書。吉爾曼使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美國官方資料，發現在1919年左右出現了明顯斷裂的傾向。1919年以前，資本的有機構成的顯著提高，抵銷了剝削率增長，使得利潤率如

---

<sup>112</sup> 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 181~182。

<sup>113</sup> 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 201。

<sup>114</sup> 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 203~204。

<sup>115</sup> 斯威齊考察了五個有可能抵銷消費不足趨勢的力量：新產業、錯誤的投資、人口增長、非生產性消費與國家支出。經過分析他認為前三個力量已經在減弱，而後兩個力量則已經增強。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 242~259。

預期地下降。但 1919 年以後，資本的有機構成、剝削率與利潤率等三個比率則大體上保持不變。<sup>116</sup>吉爾曼指出之所以會產生這個現象，是由於不變資本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他認為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不變資本變得越來越便宜。而節約勞動的技術採用，也使得可變資本下降。兩種趨勢相互抵銷，使得資本的有機構成趨於穩定。但吉爾曼並不因此否定馬克思對於利潤率下降的分析，只不過這一論斷必須稍加修正才能用來解釋壟斷資本。他指出由於資本經營管理法方的發展，使得必要的非生產性支出在企業利潤中所佔的有增加的趨勢。因此，利潤率的計算方式不再是馬克思原先設定的剩餘價值除以總資本（ $m/C$ ），而是要將剩餘價值扣除掉非生產性的支出後再除以總資本（ $m-u/C$ ）。故利潤率不再僅看於剝削率與資本的有機構成，還要看非生產性支出與生產工人的工資之間的比率。吉爾曼指出，如果按照這一基礎重新判斷，則利潤率在 1919 年以後確實已經下降，但它是由於非生產性支出與工資之間（ $u/v$ ）的比率，而不是由於資本有機構成（ $C/v$ ）的提高引起的。<sup>117</sup>

在分析壟斷資本如何抵銷消費不足趨勢的問題上，吉爾曼以為在壟斷資本階段，資本家為了銷售商品而讓原來應該用於投資的壟斷利潤，越來越多地轉移到非生產性的支出，例如廣告、企業管理人員的增加、租金與利息等等。這使得商品實現的成本提高，從而降低了利潤的份額。<sup>118</sup>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緩解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剩餘價值的不斷增長與消費不足之間的差距。

通過斯威齊、巴蘭與吉爾曼等人對各種非生產性的支出的分析，來說明壟斷資本如何以此克服資本主義消費不足的固有趨勢，使得美國在二次大戰後能維持將近三十年的長期的繁榮。從這個時期開始，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焦點便轉向對資本主義的停滯與擴張的討論。原先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發展的早期階段占有重要地位的崩潰問題，從此以後便在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討論中消失了。

119

---

<sup>116</sup>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2 1929-1990 (Hampshire: Macmillan, 1989), p.141.

<sup>117</sup>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2 1929-1990, p.141.

<sup>118</sup> Manuel Castells 著，晏山樞、楊立義、蔡平、劉憲章譯，*經濟危機與美國社會*（台北：唐山出版社，1987 年），頁 27~34。

<sup>119</sup> 斯威齊在他的書中，以專章來討論崩潰問題，從而使危機理論與崩潰論脫鉤。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 211~237。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消費不足理論得以在美國順利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與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發生，以及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各國政府改採凱因斯主義來取代原來經濟自由主義有關。在消費不足論中，由生產過剩引起的利潤率下降是生產過剩的結果。但 1970 年代，發生了一場無論是主流的凱因斯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消費不足論，都無法解釋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物價在經濟危機中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持續上漲。而利潤率的下降，在生產過剩的情況發生以前就已經發生了。因此，利潤率下降論再次回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討論當中，成為新一波爭論的焦點。

1970 年代，利潤率下降論由經濟危機的結果變成經濟危機的原因，而對這一原因的分析可分為兩個方向。英國的格林與薩克利夫把利潤率的下降歸咎於工會力量的增強，提高了貨幣工資。而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使得資本家無法通過漲價的方式將工資成本的提高轉嫁出去，導致利潤率下降。美國的博迪與克羅蒂也指出類似的過程同樣造成美國的利潤率下降。<sup>120</sup>以工資提高來說明利潤率下降，這一派被稱為利潤擠壓（Profit Squeeze）論或新李嘉圖主義（Neo-Ricardian）。另一派同樣從利潤率的下降出發來解釋經濟危機的，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論。格羅斯曼的追隨者麥蒂克認為，利潤率的下降是由於隨著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不足以用來擴大再生產，因此發生經濟危機。<sup>121</sup>另外一位有機構成提高論的代表人物是耶夫，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就從「資本一般」或「資本的內在屬性」這個概念，來分析資本主義生產。而這一概念是從眾多資本的競爭行為的結果抽象出來的。因此，有機構成提高是從邏輯上得自資本本身的概念。<sup>122</sup>並且，耶夫表示，從邏輯上看，經濟危機是與競爭和有效需求無關的，因為：

即使不考慮競爭，我們也已經指出資本主義有生產過剩和危機的趨勢。目前為止，這一論述也都假設所有的商品都是按其實際價值出售，而不存在實現上的困難；這就是說，在不考慮競爭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生產過剩也能被推論出來。<sup>123</sup>

---

<sup>120</sup>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2 1929-1990, p.318~319.

<sup>121</sup> 楊健生著，*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頁 152~153。

<sup>122</sup>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2 1929-1990, p.143.

<sup>123</sup>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2 1929-1990, p.144.



耶夫以此批評消費不足論把流通過程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這一整體分離出來，錯誤地把結果當作原因。因為資本過度積累才是商品過剩的原因，而生產過剩並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限制因素。

另外，在這一時期，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除了上述從利潤率下降這一方向展開以外，還有另一些研究者改從其它方面來分析經濟危機問題。例如，曼德爾（Ernesto Mandel）與韋斯科普夫（Thomas Weiskopf）從多因素共同作用來說明利潤率下降、奧康納（James O'connor）從國家財政來分析經濟危機與賴特（Erik Wright）將各個單一因素的危機理論放置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來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爭論。<sup>124</sup>

1990年代初，英國的克拉克（Simon Clarke）提出一個以生產過剩為基礎的比例失調論。他認為，對個別個資本家而言，市場的限制只是一種有待克服的限制，而非絕對的限制。生產過剩的客觀基礎在於，單個生產部門的資本家為了獲取超額利潤而競相採用新技術或新機器，導致了過度積累與生產過剩。由於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生產條件的差異性，使得上述情形不必然表現為普遍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表現為各生產部門之間比例失調的危機。<sup>125</sup>

1998年布倫納在5-6月號的**新左評論**上發表「全球動盪的經濟學：1950-98世界經濟特別報告」（*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98*）長篇論文。在該文中，他同樣從利潤率下降的角度來解釋二次大戰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長期下降的問題。與先前的利潤率下降論者不同，布倫納將經濟長期下降的根源，歸因於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間激烈競爭，引起的國際製造業的產能過剩與生產過剩。具備競爭優勢的廠商不斷加入，而不具備競爭力的廠商，則因為資本轉移困難而不願退出市場，導致了產能過剩與生產過剩的情況。而在面對生產過剩可能造成的經濟蕭條時，各國政府採取凱因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來避免危機的發生。避開危機的代價，使得國際製造業產能過剩與生產過剩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長期惡化。<sup>126</sup>

環顧百餘年來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爭論，基本上都圍繞著消費不足論、比例失調論與利潤率下降論這三種主要觀點發展。不過經過本節對馬克思

---

<sup>124</sup> 楊健生著，*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頁154~170。

<sup>125</sup> 楊健生著，*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頁170~174。

<sup>126</sup> 楊健生著，*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頁175~187。

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史的介紹，筆者發現這一理論史的發展方向，並不是針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本身的分析，而是順應現實的資本主義發展變化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式的解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主要聚焦在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命運之間的關係；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各流派的消長，則是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在各個時期所遇到的挑戰而轉變。這樣一來，就產生出一個奇怪的景象：或者是如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發展的早期，各流派都從馬克思的原典中引用不同的觀點來解釋資本主義現狀與命運，並且它們各自都能夠形成一套合理的解釋，但這些觀點之間卻彼此矛盾；或者是像現代時期，在前一個階段被當作經濟危機結果的觀點，在下一個階段卻成了經濟危機的原因。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史的發展所呈現出來，且尚待澄清的問題是：究竟馬克思本人的危機理論所指為何？這無疑是當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所必需克服的課題，並且也是馬克思主義在未來的發展中，能否繼續保有它作為批判資本主義利器的關鍵。在下一節裡，筆者將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出發，嘗試來處理這一問題。

## 第二節 對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各流派的評析

以消費不足論、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與利潤率下降論等三種觀點，來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主要基礎。在第二章第二節中，筆者論述了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家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認識上的差異。例如，李嘉圖特地將分配提出來當作政治經濟學的主題，這表示出他把資本主義生產，看作無異於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一切生產方式。但馬克思反對的正是這一點。並且更進一步地分析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就在於，構成這一生產方式本身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故在這一節裡，筆者將從這一基本矛盾，來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三種主要流派的論點，以此試圖釐清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究竟是什麼。

### 一、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

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論是杜岡首先提出，用以反對作為第二國際正統的消費不足理論。他援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提出的簡單再生產的公式：

I、 $4000c+1000v+1000m=6000$  生產資料；

II、 $2000c+500v+500m=3000$  消費資料。<sup>127</sup>

杜岡在考察了這一公式後，所得到的結論是：

首先，在全部剩餘產品都被消費的條件下，只要生產比例適當，一切商品需求都必定與供給相等。<sup>128</sup>

其次，資本主義生產會給自己開闢市場。只要有足夠的生產能力能夠擴大生產，只要社會生產比例安排適當，就能夠相應地擴大需求。在這種條件下，社會生產擴大，同時社會消費縮減，絲毫不會引起社會供給和社會需求的失衡。只要社會生產比例適當，無論消費需求怎樣減少，也不會使市場上產品供給總量超過需求。<sup>129</sup>

最後，即使工資大量下降，社會產品的銷售也不會發生任何困難。資本主義經濟即使在國民消費絕對大量減少的情況下也不會有崩潰的危險。在按比例安排社會生產的條件下，不管消費需求減少多少，都不會使市場上的產品供給總量超過產品需求總量。在社會財富增加的同時，社會收入的減少，而社會供給和需求毫不失衡。<sup>130</sup>

總之，在杜岡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是群眾的消費不足，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所引起的生產部門比例失調所致。因此，只要各個生產部門保持正確的比例，不管消費方面發生什麼問題，都不會發生生產過剩或需求不足。

另外，希法亭在**金融資本**一書中，對於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也提出類似杜岡的看法。他指出：

很明顯，在整個生產生產資料的產業部門和生產消費資料的產業部

---

<sup>127</sup> 公式中的  $c$  = 不變資本， $v$  = 可變資本， $m$  = 剩餘價值，並且假定剩餘價值率  $m/v = 100\%$ 。數字可以表示幾百萬馬克，幾百萬法郎，或幾百萬鎊。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440~441。

<sup>128</sup> 劉明遠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和週期理論的結構與變遷**，頁 245。

<sup>129</sup> 劉明遠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和週期理論的結構與變遷**，頁 246。

<sup>130</sup> 劉明遠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和週期理論的結構與變遷**，頁 248。

門之間必然存在的比例關係，對於每個個別的生產部門來說，也必然以類似的方式存在。但是，這種圖式同時也表明，只要保持這些比例，資本主義生產——不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就能不受干擾地進行。相反，在比例遭到破壞情況下，例如在已消耗的和新投入的資本之間的比例遭到破壞的條件下，即使是在簡單再生產中，危機也可能發生。因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危機的原因必然是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大眾消費的不足。消費過度膨脹本身像生產資料的生產保持不變或減少一樣，也必然導致危機。同樣不能由上述圖式本身而得出商品普遍生產過剩可能性的結論，相反地倒是可以指出：現有生產力所允許的任何生產的擴大都是可能的。<sup>131</sup>

有鑑於這三種主要流派都各自有支持者引用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或對這一公式稍加變化後加以利用。因此，筆者認為在提出本文的觀點以前，有必要先介紹一下這個公式：

I、 $4000c+1000v+1000m=6000$  生產資料；

II、 $2000c+500v+500m=3000$  消費資料。

馬克思提出這個公式的目的是要考察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及流通。他指出考察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必須從商品資本的循環公式出發：

我們應當分析的是  $W'-G(g)-W(w)\cdots P\cdots W'$ （筆者按：這是商品資本的循環公式。其中  $W$  指商品； $G$  指貨幣； $g$  指由剩餘價值轉化的貨幣形式； $w$  指由剩餘價值轉化的商品形式； $P$  指生產領域）。這個流通公式，在這裡，消費必然會起作用；因為起點  $W'=W+w$ ，即商品資本，既包含不變資本價值和可變資本價值，也包含剩餘價值。所以，它的運動既包括生產消費，也包括個人消費。在  $G-W\cdots P\cdots W'-G$  循環（筆者按：貨幣資本的循環）和  $P\cdots W'-G'-W\cdots P$  循環（筆者按：生產資本的循環）中，資本的運動是起點和終點：這一運動自然也包括消費，因為商品，即產品，必須出售。但是，只要商品已經出售，這個商品以後變成什麼，對單個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關係的。相反地，在  $W'\cdots$

---

<sup>131</sup> Rudolf Hilferding 著，**金融資本**，頁 288~289。

W'，運動中，正是要通過說明總產品 W'的每一價值部分會變成什麼，才能認識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在這裡，總的再生產過程既包括資本本身的再生產過程，也包括以流通為媒介的消費過程。<sup>132</sup>

馬克思這麼做的目的，不僅是因為只有使用商品資本的循環公式，才能顯示出每一部份的價值轉變為什麼樣的使用價值即商品。並且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發生作用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所以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要考慮的不僅價值的補償，更重要的是實物的補償：

當我們從單個資本的角度來考察資本的價值生產和產品價值時，商品產品的實物形式，對於分析是完全無關的，例如，不論它是機器，是穀物，還是鏡子都行。這始終只是舉例而已，任何一個生產部門都同樣可以作為例證。我們必須考察的是直接的生產過程本身。這種生產過程，在任何場合，都表現為一個單個資本的過程。說到資本的再生產，我們只要假定，代表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商品產品，會在流通領域內找到機會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要素，從而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同樣，我們只要假定，工人和資本家會在市場上找到他們用工資和剩餘價值購買的商品。但是，當我們考察社會總資本及其產品價值時，這種僅僅從形式上來說明的方法，就不夠用了。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另一部分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這在表現出總資本執行職能的結果的產品價值本身內形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sup>133</sup>

並且對資本再生產過程的考察，馬克思還做了如下的假定：

直接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生產上消費掉的**資本**，就它的價值來說，怎樣由年產品得到補償？這種補償的運動怎樣同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消費和工人對工資的消費交織在一起？因此，首先要研究原有規模的

---

<sup>132</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435~436。

<sup>133</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437~438。

再生產。其次，不僅要假定，產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交換，而且還假定，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沒有發生任何價值革命。如果價格同價值發生偏離，這種情況對社會資本的運動並不會有任何影響。雖然單個資本家這時分到的價值份額將不再和他們各自預付的資本成比例，不再和他們每人各自生產的剩餘價值量成比例，但總起來說，進行交換的仍然是同一產品量。至於價值革命，那麼，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發生的，就不會改變全部年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之間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發生的，就會成為干擾。**第一**，這種干擾只有在被看作是對保持不變的價值比例的**偏離**時，才能被認為是干擾；但是，**第二**，關於年產品價值以一部分補償不變資本，以另一部分補償可變資本的規律一經證明，那麼，價值革命，無論在不變資本的價值上還是在可變資本的價值上發生，都不會改變這個規律。它所改變的，只是執行著這種或那種職能的價值部分的相對量，因為原有價值將被另外的價值取而代之。

134

雖然就資本主義的基礎與它的生產條件而言，將研究的對象假定為規模不變的簡單再生產是個奇怪的假定。但馬克思指出，因為即使是簡單再生產也有剩餘價值的產生。雖然在簡單再生產的場合，剩餘價值必須全部由資本家自己消費掉，但簡單再生產仍舊是積累與擴大再生產的一個現實因素。<sup>135</sup>另外，在第二個假定中，首先，他假定產品是按照它們的價值交換。但馬克思表示，即使商品不是按照它們的價值交換，而是按照由利潤率的平均化運動所決定的生產價格交換，對問題也沒什麼影響。因為這只牽涉到剩餘價值在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而不影響使用價值量，即以商品形式存在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其次，再假定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不發生價值革命。**第一**，馬克思表示，除非這樣的價值革命是普遍地和均衡地發生在一切生產部門，否則在再生產所需的使用價值量不變的時候，就會破壞簡單再生產。**第二**，在生產過程中消費掉的資本價值，必須從年產品的價值當中，取出一部分補償不變資本，而另一部份則用來補償可變資本。<sup>136</sup>

---

<sup>134</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436~437。

<sup>13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438。

<sup>136</sup> 馬克思指出，由於斯密沒有「勞動二重性」的概念，並且他考察的只是簡單再生產。因此，他只能從區分「總收入」與「純收入」的辦法，說明年產品價值中必須有一部分用來補償不變資

按照這一公式，如果要維持簡單再生產，則剩餘價值都要作為收入消費掉即  $I(v+m) = II(c)$ 。然而前面提過，在生產過程中發生作用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所以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要考慮的不僅價值的補償，更重要的是實物的補償。馬克思指出，由於固定不變資本即機器設備等更新的週期不同，每年總是只有一部分壽命完結的機器設備需要更新，而另一部份還不需要更新的機器設備，它們已消耗的價值則以貨幣形式保存起來。當考察  $II(c)$  即固定資本的實物補償出現上述情況時，假定其中需要更新機器設備的那部分價值為  $IIc(1)$ ，不需要更新而只需要補償的部分價值為  $IIc(2)$ 。馬克思指出除非  $IIc(1) = IIc(2)$ ，否則即使是簡單再生產也會發生危機。相反地，如果  $IIc(1) > IIc(2)$ ，則會造成  $Im$  的生產不足；如果  $IIc(1) < IIc(2)$ ，則會造成  $Im$  的生產過剩。而這兩種情況，在擴大再生產時無疑都會出現。<sup>137</sup>

介紹完了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後，現在回過頭來分析杜岡與希法亭對此一公式的看法。杜岡從馬克思這一公式得到的結論是：「只要各個生產部門保持正確的比例，不管消費方面發生什麼問題，都不會發生生產過剩或需求不足。」從而他把這一結論推到極點：

如果除一人以外，全部工人都消失而為機器所代替，那麼，這個單獨的工人就會把整個龐然大物的機器開動起來，並憑藉它來生產新機器以及資本家們的消費品。工人階級就會消失，而這絲毫也不會妨礙資本的自我擴張過程。資本家們不會得到更少量的消費品，一年的全部產品都會實現，並為次年的生產和資本家消費所利用。即使資本家們想限制他們自己的消費，也不會引起什麼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消費品

---

本，以這種方式把資本這一生產要素表現出來。斯密說：「一個大國全體居民的總收入，包含他們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在總收入中減去維持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費用，其餘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純收入。」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263。而李嘉圖則是把年產品用來補償資本的部分，看作全部加入可變資本即工資。他說：「必須了解，一國的產品全部都是要被消費的；但究竟由再生產另一種價值的人消費，還是由不再生產另一種價值的人消費，這裡面的區別卻是難以想像的。當我們說節約收入以增加資本時，意思就是說：『所謂增加到資本中去的那一部份收入，是由生產性勞動者，而不是由非生產性勞動者消費的。』」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128。因此，馬克思之所以設計出簡單再生產公式的目的，根本上是為了要考察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沒有處理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

<sup>137</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521~524。

的生產部分地停止，而更大的一部分社會產品是由生產資料構成，這些生產資料又可以用來進一步擴大生產。例如，人們生產鐵和煤，鐵和煤又總是用來擴大鐵和煤的生產。每一個後續年份的鐵和煤的擴大生產，用掉了前一年所增產的大量產品，直至必需的礦物耗盡為止。<sup>138</sup>

首先，馬克思已經指出簡單再生產能夠維持平衡的唯一條件是  $IIc(1) = IIc(2)$ ，否則也會發生危機。第一、規模不變的再生產或者說簡單再生產，是對現實的再生產過程的抽象概念。第二、 $IIc(1) = IIc(2)$  又是從理論上得出的維持平衡的唯一條件。可是現實的資本主義再生產總是以擴大或縮小的規模進行，所以這個條件實際上幾乎不可能達成。因此，馬克思認為，只要社會的再生產採取資本主義的形式，那麼，即使是簡單再生產也會發生危機：

這個關於固定資本的例子，在再生產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固定資本生產和流動資本生產的不平衡，是經濟學家在說明危機時慣用的根據之一。但是，如果說在固定資本僅僅維持原狀的情況下，在理想的正常生產的前提下，在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的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這種不平衡也能夠發生，並且必然會發生，那在他們看來倒是有點新奇的。<sup>139</sup>

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不僅是要用來考察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沒有研究過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並且其真正意圖是要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考察，來說明資本主義生產發生經濟危機的必然性。而不是像杜岡與希法亭所認知的那樣，好像馬克思同意只要生產的比例適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會發生危機。

其次，如果像杜岡所說，即使整個社會除了一個工人之外，全部工人階級都消失而由機器所代替，這個孤單的工人還是可以操作機器，讓資本主義生產持續進行而不會有危機。然而，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勞動力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機器則不然，它只是通過勞動過程把自己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用機器來生產新機器，只能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而不會使價值量有任何增加。如果工人階級消失，不僅剩餘價值的生產消失，而且資本也無法積累。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又

---

<sup>138</sup> 轉引自：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 188。

<sup>139</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527。



怎會願意進行生產呢？因此，杜岡的說法不但割裂了生產與消費的內在聯繫，並且還抽掉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與它賴以存在的生產關係。<sup>140</sup>

另外，馬克思為  $\text{IIc}(1) > \text{IIc}(2)$  或  $\text{IIc}(1) < \text{IIc}(2)$  的情況，即再生產的不平衡提出了唯一的解決方式：

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一旦廢除，問題就歸結如下；壽命已經完結因而要用實物補償的那部分固定資本(這裡是指在消費資料生產中執行職能的固定資本)的數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數量很大(像人一樣，超過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會很小。假定其他條件不變，消費資料年生產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輔助材料的數量不會因此減少；因此，生產資料的生產總額在一個場合必須增加，在另一個場合必須減少。這種情況，只有用不斷的相對的生產過剩來補救；一方面要生產出超過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資本；另一方面，特別是原料等等的儲備也要超過每年的直接需要(這一點特別適用於生活資料)。這種生產過剩等於社會對它本身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物質資料的控制。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這種生產過剩卻是無政府狀態的一個要素。

141

而希法亭對這段話的解讀是：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在一定的限度內，這種相對生產過剩也必然經常發生，並表現於為排除干擾而經常存在的商品儲備。另一方面，與此相應的是歸產業資本家支配的貨幣資本的儲備，這種儲備使他們有可能在出現干擾時，從商品儲備中置備為繼續進行自己的生產所必需的因素。所有資本家為對付暫時的干擾，即使在正常時期也必須掌握的這種

---

<sup>140</sup> 馬克思在分析由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引起的相對生產過剩時，就已經對杜岡所提出的這類觀點提出批評：「如果說資本家只需要在他們之間互相交換和消費商品，那麼，這就忘記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部性質，忘記了這裡的問題是資本的增殖，而不是資本的消費。」Karl Marx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 286。

<sup>141</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526~527。

貨幣資本，不能同那種商品滯銷時所必要的準備貨幣資本混為一談。在繁榮時期，一方面是生產急劇擴大，另一方面是以前的準備貨幣資本向生產資本轉化。準備貨幣資本減少，這意味著抗干擾的因素喪失。於是，這就成為產生危機的一個原因。

另一方面可以確定，這種相對生產過剩的必然性並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再生產過程的性質的基礎上的（只要資本主義社會裡表現為固定資本的生產因素達到較大的規模）。這種由技術的自然狀況必然產生的「生產過剩」，實際上是單純的儲備的形式，它本身也是一個有調節、滿足需要的經濟所固有的，不能同危機時期的普遍生產過剩混為一談。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這種生產過剩有時也形成加劇危機的因素。<sup>142</sup>

不論社會的形式如何，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總是必須不斷地進行。因此，再生產過程是一切人類社會為了維繫生存所共有的，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產物。這一點，希法亭是清楚的。並且，筆者認為，馬克思這段話真正要說的是：「除非廢除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而將以『等價交換』為前提的商品交換改變為以『使用價值』為前提的產品交換，否則就不可能解決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所引起的兩部類的相對生產過剩的危機。」並且，從使用價值的角度而言，生產「過剩本身並不是什麼禍害，而是利益；但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它卻是禍害。」<sup>143</sup>故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是來自於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一方面，在社會的再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是使用價值，這是一切社會再生產共同的必要物質條件。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與動力卻是剩餘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即消費，不論是生產的消費或個人的消費。

前面說過，如果  $I_{lc}(1) > I_{lc}(2)$ ，則會造成  $I_m$  的生產不足；如果  $I_{lc}(1) < I_{lc}(2)$ ，則會造成  $I_m$  的生產過剩。而這兩種情況無疑都會引起再生產過程的停滯與危機：

在第一種情況下， $I_{lc}(1)$  大於  $I_{lc}(2)$ ，從而  $I_{lc}(1)$  方面有一個

---

<sup>142</sup> Rudolf Hilferding 著，**金融資本**，頁 278~279。

<sup>143</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526。

貨幣餘額不能再轉化為固定資本；如果假定  $I_m$  的餘額 =  $I_{lc}(1)$ ，在  $I_m$  方面就會有同等數量的貨幣餘額不能轉化為消費資料。

在第二種情況下， $I_{lc}(1)$  小於  $I_{lc}(2)$ ，從而在  $200I_m$  和  $I_{lc}(2)$  兩方面都出現貨幣不足，都出現同樣的商品過剩；如果假定  $I_m$  的餘額 =  $I_{lc}(1)$ ，在  $I_{lc}(2)$  方面就會出現貨幣不足和商品過剩。

我們假定  $I_m$  的餘額總是等於  $I_{lc}(1)$  — 因為生產是由訂貨決定的，並且再生產也不會因為第 I 部類今年多生產一些第 II 部類的不變資本固定組成部分，明年又多生產一些它的不變資本流動組成部分，而有所改變，— 那麼，在第一種情況下，只有當第 I 部類用  $I_m$  來購買第 II 部類的一部分剩餘價值時， $I_m$  才能再轉化為消費資料；所以，第 II 部類的這部分剩餘價值不是被消費掉，而是由第 II 部類以貨幣形式積累起來；在第二種情況下，就只有靠第 I 部類自己付出貨幣來解決，但這個假定已經被我們拋棄了。<sup>144</sup>

貨幣在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只有兩種場合會出現：第一，兩部類的資本家中的任一方，為了使流通順利進行而投入的貨幣額。這個條件的前提是，資本家除了生產資料外，還有一定量的貨幣儲備。但這個貨幣額最後會回到它原來的預付者手中，從而它在這個場合只是作為支付手段。例如，由於第一部類的產品是不能直接用作個人消費的生產資料，故第一部類的資本家必須預付一個與  $I_v$  價值相等的貨幣額，即與第一部類生產工人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等值的貨幣工資。第一部類的生產工人，再將它拿去與第二部類的資本家交換個人消費資料。最終這個貨幣額將通過第二部類的資本家向第一部類的資本家購買生產資料時，流回原先預付它的第一部類資本家手中。第二，它代表尚不需更新的固定不變資本中，已損耗掉的部分的價值。機器設備不是每年都必須更新的，例如，一部價值 500 的生產機器，假定它每年通過生產過程把自身的價值 100 轉移到產品中去，待該年的產品出售後，這 100 的價值就會流回，並以貨幣形式貯存起來。因此，在第五年結束之前，機器全部的價值 500，就會分別以它的實物形式與貨幣形式共同存在。

---

<sup>144</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523。

在再生產公式裡，馬克思只是賦予貨幣以讓流通過程順利進行與價值保存的功能。而希法亭卻把貨幣在前一個場合的功能擴大，並賦予它解決兩部類的相對生產過剩的任務。之所以提出這種解釋，或許是與他所關注的金融資本在當時的發展有關。可是，這種解決方式就像馬克思對對外貿易所作的結論一樣，它只能推遲危機的發生，進而使危機的範圍擴大。並且正因為危機的根源不是生產過剩本身，因此這種補救辦法也就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危機：

在兩個場合，對外貿易都能起補救作用；在第一個場合，是使第 I 部類保留貨幣形式的商品轉化為消費資料；在第二個場合，是把過剩的商品銷售掉。但是，對外貿易既然不是單純補償各種要素(按價值說也是這樣)，它就只會把矛盾推入更廣的範圍，為這些矛盾開闢更廣闊的活動場所。<sup>145</sup>

由於希法亭誤解了馬克思的真實意圖，使得他以為馬克思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是由於生產的比例失調引起的，而不是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內在矛盾引起的。因此，他才會把經濟危機看作僅僅是「流通過程的阻礙。」<sup>146</sup>從而以為只要把再生產公式中的貨幣儲備與金融資本聯繫起來，就能夠克服兩部類的相對生產過剩的危機。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不斷地發生經濟危機，是它自身的、內在的基本矛盾制約下的必然結果。因此，危機根本不可能僅僅通過對生產部門內部的比例方面的調整來加以根絕。至於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由生產部門比例失調引起的危機，即以社會勞動在各生產領域之間分配的比例失調為基礎的危機，只有在談到資本競爭的時候才能談到。<sup>147</sup>亦即，馬克思以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的基礎上，生產部門的比例失調只能依靠由資本競爭所引起的利潤率不斷地平均化的運動來修正。<sup>148</sup>

---

<sup>14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526。

<sup>146</sup> Rudolf Hilferding 著，**金融資本**，頁 272。

<sup>147</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595。

<sup>148</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229~234。

## 二、消費不足論

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歸因於消費不足，被視為是第二國際的正統觀點，例如，考茨基就說：

資本家和被他們剝削的工人，隨著前者的財富和後者的人數的增多，提供了一個雖然不斷增長的市場，但是這個市場並不像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增長得那樣快，它對於資本主義大工業創造的消費資料並不夠用。資本主義大工業必須在自己的領域外，在還沒有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的行業中尋找補充的市場，它找到了這個市場，並且也日益擴大了這個市場。但是，擴大得不夠迅速，因為這個補充市場沒有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靈活性和擴張能力。只要資本主義生產變成了發達的大工業，...它就有可能這樣飛越地發展，即在短期內超過任何市場的擴大。因此，每一個隨著市場的顯著擴大出現的繁榮時期，從一開始就被決定是短暫的，危機是它的必然結局。<sup>149</sup>

經由考茨基的這番論述看來，危機的產生好像只是因為市場的擴大跟不上生產擴大的速度造成的。從生產與消費的失衡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成為這個流派研究經濟危機理論的基礎。消費不足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商品生產太多無法實現。因此，危機的原因是剩餘價值生產得太多，而不是太少引起的。

盧森堡為了捍衛消費不足論，她也對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做了分析。她認為，在馬克思再生產公式裡看不到資本積累的動力，因此這公式看起來就好像在兜圈子：

這裡我們要問：積累的起點是什麼？這是我們考察兩個部類積累過程彼此依賴程度的方法。無疑地，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第二部類，就它的積累決定於現有的追加生產資料而言，是依賴第一部類的。反過來看，第一部類的積累依賴於可供追加勞動力用的相應數量的追加消費

---

<sup>149</sup> 轉引自：劉明遠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和週期理論的結構與變遷*，頁 149~150。

品。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只要這兩個條件都被遵守了，兩部類的積累必然像馬克思的公式所顯示的那樣，將會自動地年復一年地進行。我們所列舉的條件不過是積累的必要條件，沒有了它們，就不能進行積累。兩部類也許有積累的欲望，但積累的欲望，加上積累的技术前提，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經濟中是不夠的。為了保證積累事實上前進和生產事實上能夠擴大，需要另外一個條件，即對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須也在增長。在馬克思的公式中，這形成了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的基礎。但這個不斷增長的需求是從哪裡來的呢？

它不可能從第一部類和第二步類的資本家本身那裡來——這是可以立刻肯定的一它不能從他們的個人消費中產生。相反地，積累的實質就是資本家節制自己，使自己不消費一部分的剩餘價值，把它用來為他人生產使用價值，而這部分的剩餘價值——至少從絕對數字看——是不斷地增加的。的確，隨著積累的增加，資本家階級的個人消費也將增加，甚至，所消費的總價值也有增加，但儘管如此，用來供資本家消費的仍然不超過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積累的基礎的確是這麼一個事實：即資本家節制自己不把全部的剩餘價值消費掉。但剩下的剩餘價值，即要用來積累的那部分將會如何呢？它給誰使用呢？按照馬克思的公式，第一部類擁有優先權：這個過程是以生產資料的生產為起點。那麼，誰需要這些增加的生產資料呢？這個公式回答道：第二步類需要它們來增加生產消費品的數量。那麼，誰需要這些增加的消費品呢？這個公式回答道，當然是第一部類，因為第一部類現在僱用了更大量的工人。很清楚地我們是在兜圈子。從資本主義觀點來看，這樣做是荒唐的——生產較多的消費品，只是為了維持更多的工人，而且生產更多的產品，只為讓這些剩餘工人能繼續被僱用。<sup>150</sup>

從這個段話來看，盧森堡的問題主要在於，她誤將杜岡對這一公式的解讀，當作馬克思本人的看法。<sup>151</sup>所以她認為，從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看來，資本主義生產好像不是為了剩餘價值，反倒是為生產而生產。她強調指出，工人階級能夠消費的只是形成他們的工資那部分可變資本，且資本家為了進行再生產不可能消

---

<sup>150</sup>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103~104.

<sup>151</sup> 楊健生著，*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頁 99。

費掉所有的剩餘價值。<sup>152</sup>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總是存在一部分無法實現的剩餘價值，而這部份剩餘價值只能夠在非資本主義社會裡找到它的「有效需求。」一旦非資本主義社會全部被納入資本主義的統治，則資本主義社會將會因為剩餘價值無法實現而崩潰。

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認為盧森堡忘記了，資本家為了進行資本積累而追加工人時，對消費資料的需求也相應地增加了。<sup>153</sup>但筆者以為，盧森堡並非不清楚馬克思對追加資本的看法，而是由於她把杜岡的比例失調論，看作是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的結論：

公式是承認危機的存在的，可是，那只是因為生產內部比例失調的緣故，即缺乏社會對生產過程的統制的緣故。但它排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之間的深刻而根本的衝突。而這個衝突正是由資本積累引起的，它爆發為週期性危機，並驅使資本向不斷擴大市場邁進。<sup>154</sup>

由於這樣的混淆，盧森堡從理論上勢必不能贊同再生產公式的規定，並且為了堅持消費不足論的正確性，還必須將此公式當作批評的對象：

馬克思的公式排斥了生產的跳躍式的擴大。它只容許與剩餘價值的形成在步調上是緊密地一致的，生產逐步擴大，而這種逐步擴大是以剩餘價值的實現與資本化兩者間相等同為基礎的。...這個公式是假定一樣包括兩部類，從而包括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部門的積累。它排斥需求的跳躍式擴大，也同樣地排斥資本主義生產的個別部門的片面發展。

因此，這個公式所假設的總資本運動是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過程

---

<sup>152</sup>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105.

<sup>153</sup> Nikolai Bukharin and Rosa Luxemburg 著，紫金如、梁丙添譯，**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81。

<sup>154</sup>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326~327.

相矛盾的。<sup>155</sup>

前面提過，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不是要考察「有效需求」的問題，只是要考察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及流通。所以也不存在盧森堡在這裡所說的，**資本論第二卷與資本論第三卷**之間相互矛盾的問題。<sup>156</sup>

總之，盧森堡真正的問題在於，她混淆了杜岡與馬克思對再生產公式的看法。因此，爲了證明消費不足論的正確性與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她只能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外部，而不能從體系的內部，來尋找資本主義社會崩潰的根源。

斯威齊則是另一個消費不足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從**資本論**中引述了他認爲足以說明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是消費不足的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

這個剩餘價值的取得，形成直接的生產過程，而這個生產過程，...一旦可以榨出的剩餘勞動量物化在商品中，剩餘價值就生產出來了。...現在開始了過程的第二個行為。總商品量，...都必須賣掉。如果賣不掉，或者只賣掉一部分，或者賣掉時價格低於生產價格，那麼，工人固然被剝削了，但是對資本家來說，這種剝削沒有原樣實現，這時，榨取的剩餘價值就完全不能實現，或者只是部分地實現，甚至資本也會部分或全部地損失掉。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前者只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後者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和社會消費力的限制。但是社會消費力既不是取決於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取決於絕對的消費力，而是取決於以對抗性的分配關係為基礎的消費力；這種分配關係，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只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以內變動的最低限度。這個消費力還受到追求積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擴大資本和擴大剩餘價值生產規模的欲望的限制。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它是由生產方法...的不斷革命，由不斷和這種革命聯繫在一起的現有資本的貶值，由普遍的競爭鬥爭以及僅僅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滅亡而改進生產和擴大生產規模的必要性決定的。因此，市場必須不斷擴大，以致市場的

---

<sup>155</sup>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322.

<sup>156</sup>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322~323.



聯繫和調節這種聯繫的條件，越來越採取一種不以生產者為轉移的自然規律的形式，越來越無法控制。這個內部矛盾力圖用擴大生產的外部範圍的辦法求得解決。但是生產力越發展，它就越和消費關係的狹隘基礎發生衝突。在這個充滿矛盾的基礎上，資本過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過剩結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為在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量雖然會增加，但是生產剩餘價值的條件和實現這個剩餘價值的條件之間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增長。<sup>157</sup>

第二個段落：

資本主義生產全力擴張的時期，通常就是生產過剩的時期。因為生產能力決不能使用到這個程度，以致它不僅能夠生產更多的價值，而且還能把它實現。商品的出售，商品資本的實現，從而剩餘價值的實現，不是受一般社會的消費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數人總是處於貧困狀態、而且必然總是處於貧困狀態的那種社會的消費需求的限制。<sup>158</sup>

以及最後一個段落：

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sup>159</sup>

斯威齊認為，「在這些分散的段落中，馬克思預示了一條推理的路線（筆者按：這裡指的是消費不足論），如果馬克思能活到完成他理論著述的話，這條路線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面描述中會成為首要的東西。」<sup>160</sup>

從這些段落看來，似乎馬克思真的贊同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歸咎於

---

<sup>157</sup> 刪節的部份為 Sweezy 所刪。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72~273。

<sup>158</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二卷**，頁 352。

<sup>159</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548。

<sup>160</sup> 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 199。

工人消費的不足。但是，只要仔細推敲一下馬克思在這些段落中，用來描述消費的幾個詞句，就能看出隱含在背後的不同意義。例如，在第一個段落提到的「直接剝削的條件」很清楚是指生產領域的「社會生產力」；而「實現剝削的條件」也很清楚是指流通領域中剩餘價值的實現，即商品的出售。因此，「實現剝削的條件」要受到「不同生產部門對生產資料的需要」與「社會消費力即個人消費的需要」的限制。但社會的消費力既不是取決於生產力的極限，也不是取決於人類無窮的欲望，而是取決於以對抗性的分配關係為基礎的消費力。而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對抗性分配關係，事實上就是指資本主義中的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在利潤與工資方面的鬥爭。

另外，馬克思在這裡所指的消費，不僅是指個人的消費，還包含了生產資料的消費。而這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往往被消費不足論者忽視了，例如，斯威齊在引用消費增長率與生產資料增長率之間的關係，來說明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消費不足傾向時，就把生產資料的消費與個人的消費對立起來。<sup>161</sup>這是由於消費不足論者們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流通領域即剩餘價值的實現，而忽略了資本的生產領域。<sup>162</sup>最後，消費不足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是剩餘價值生產太多，而不是太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看法，也是因為他們只看到流通領域的商品滯銷，卻沒有看到商品滯銷的現象背後，不過是社會消費力受到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決定的分配方式制約的結果。

### 三、利潤率下降論

在對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中的利潤率下降論進行評析以前，筆者以為有必要先將古典經濟學家與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稍作比較，通過這個比較也為以利潤率下降為基礎的危機理論提供判準。

關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由於利潤率下降引起的看法，並不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的，古典經濟學家早已發現這個現象。斯密認為，利潤率下降是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和資本競爭加劇所造成的必然且正常的現象。<sup>163</sup>與斯密相反，李嘉圖

---

<sup>161</sup> Paul Sweezy 著，**資本主義發展論**，頁 202~204。

<sup>162</sup> 耶夫就曾批評指出，消費不足論者把流通過程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這個整體中分離出來。

<sup>163</sup> 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81。

則對利潤率下降的現象感到惶惶不安。<sup>164</sup>他認為，一方面，隨著資本積累的擴大和人口增加，從而對穀物的需求也會相對地增加。但另一方面，由於肥沃的土地越來越少，使得穀物的價格因為生產它所需的勞動量增加而上漲。穀物是構成工人工資的主要內容，所以由穀物價格上漲所引起的工資提高，將會造成資本家的利潤下降。<sup>165</sup>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積累的動機，將隨著利潤的減少而降低，甚至停止。<sup>166</sup>總而言之，李嘉圖對利潤率下降的分析，是與地租率的不斷提高聯繫在一起的。因而，他是從土地肥力與級差地租來考察利潤率下降的問題。

馬克思從古典經濟學那裡把這個問題接了過來，批判地發展了屬於他自己的利潤率下降論。<sup>167</sup>與古典經濟學家的看法不同，馬克思認為，利潤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它們彼此之間的有一定的內在聯繫，而且計算的方式不同。<sup>168</sup>但他認為，利潤率下降不是由土地肥力遞減引起的，他將這個問題與資本積累聯繫起來考察，並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擴大再生產的看法有誤。例如，斯密認為「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sup>169</sup>而且「無論在什麼社會，商品價格歸根到底都分解為那三個部分或其中之一。」<sup>170</sup>至於生產資料，他則說：

也許有人認為，農業家資本的補充，即耕畜或他種農具消耗的補充，應作為第四個組成部份。但農業上一切用具的價格，本身就由上述

---

<sup>164</sup> Marx 指出「李嘉圖錯誤地把剩餘價值和利潤等同起來；只有在全部資本都由可變資本組成，或者說，全部資本都直接用於工資的場合，剩餘價值和利潤才是等同的；因此，李嘉圖在『利潤』名義下考察的，一般說來只是剩餘價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頁 485。

<sup>165</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101~103。

<sup>166</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103。

<sup>167</sup> 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發展，利潤率卻越是下降的這一現象，馬克思指出：「這從每一個方面來說都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的規律，是理解最困難的關係的最本質的規律。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是最重要的規律。這一規律雖然十分簡單，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理解，更沒有被自覺地表述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2 版，頁 148。

<sup>168</sup> 利潤率(p')=剩餘價值(m)/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m/總資本(C);剩餘價值率(m')=剩餘價值(m)/可變資本(v)=m/v。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56~57。

<sup>169</sup> 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47。

<sup>170</sup> 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45。

那三個部份構成。就耕馬說，就是飼馬土地的地租，牧馬勞動的工資，再加上農業家墊付地租和工資的資本的利潤。因此，在穀物價格中，必須以一部份支付耕馬的代價及其維持費，但其全部價格仍直接或最後由地租、勞動及利潤這三部份組成。<sup>171</sup>

由於斯密從「收入」來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而不是從生產領域。這麼一來，作為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他只能通過區分「總收入」與「純收入」的辦法再現出來。<sup>172</sup>

另外，李嘉圖也把資本家用來擴大再生產的部份，當作全部用在工人的消費資料上：

必須了解，一國的產品全部都是要被消費的；但究竟由再生產另一種價值的人消費，還是由不再生產另一種價值的人消費，這裡面的區別卻是難以想像的。當我們說節約收入以增加資本時，意思就是說：所謂增加到資本中去的那一部份收入，是由生產性勞動者，而不是由非生產性勞動者消費的。<sup>173</sup>

馬克思則認為，資本家為了積累而投入的追加資本，不但要轉化為可變資本，也要轉化為不變資本，即必須把它分別用以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並且隨著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有機構成會不斷提高。而這種提高又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另一種表現：

由於更多地使用機器和一般固定資本，同數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輔助材料轉化為產品，也就是說，可以用較少的勞動把

---

<sup>171</sup> 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45。

<sup>172</sup> 斯密並非不知道生產資料的存在，只是因為他只有簡單再生產的概念，並且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勞動二重性的概念。所以在他看來，任何一個資本家所使用的生產資料，不論是由他自己所生產出來的，或者是向其他的資本家購買來的，最終都可以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三個部分。故斯密認為，只需要通過區分「總收入」和「純收入」的辦法，以兩者之間的差額將生產資料的價值部分再現出來即可。

<sup>173</sup> 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 128。

它們轉化為產品。不變資本價值量的這種增加，一雖然它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在物質上構成不變資本的各種使用價值的實際數量的增加，一會使產品相應地日益便宜。每一個產品就其本身來看，同較低的生產階段相比，都只包含一個更小的勞動量，因為在較低的生產階段上，投在勞動上的資本比投在生產資料上的資本大得多。<sup>174</sup>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在剩餘價值率不變甚至提高的情況下，一般利潤率會由於所使用的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相對降低而趨向下降。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規律：

資本主義生產，隨著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日益相對減少，使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甚至提高時，剩餘價值率會表現為一個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以後我們將會看到，為什麼這種下降不是以這個絕對的形式而是以不斷下降的趨勢表現出來。)因此，一般利潤率日益下降的趨勢，只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日益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現。這並不是說利潤率不能由於別的原因而暫時下降，而是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證明了一種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餘價值率必然表現為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因為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同它所推動的物化勞動的量相比，同生產中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量相比，不斷減少，所以，這種活勞動中物化為剩餘價值的無酬部分同所使用的總資本的價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斷減少。而剩餘價值量和所使用的總資本價值的比率就是利潤率，因而利潤率必然不斷下降。

175

綜上所述，斯密、李嘉圖與馬克思對利潤率下降的各自看法是：斯密認為，利潤率的下降是資本競爭的正常現象；李嘉圖認為，利潤率下降是工資提高的結果；而馬克思則認為，雖然利潤率也可能由其他原因而暫時下降，但與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相伴、並進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才是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因為它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所證明的邏輯必然性。接下來，筆者將以此來

---

<sup>174</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37。

<sup>17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37。

評析以利潤率的下降，來分析經濟危機的幾種不同角度的觀點。

格羅斯曼嘗試以表式來證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所提出的利潤率下降的規律。他借用了鮑威爾（Otto Bauer）用來回應盧森堡關於在封閉的資本主義系統中，剩餘價值不能實現的問題時，仿造馬克思的再生產公式所設計出的表式。<sup>176</sup>格羅斯曼按照鮑威爾的，假定不變資本每年按 10% 增加，可變資本與勞動力每年各按 5% 增加，剩餘價值率 100%。以這個速度進行將它繼續推進，在第 21 年的時候，提供資本家個人消費的部分開始逐年下降。直到第 35 年這個部份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說，按照格羅斯曼這個表式所設定的積累速度，這個體系最終會由於剩餘價值生產不足而崩潰。因此，他認為鮑威爾這個想用來證明資本主義雖然會有短暫的危機，但永遠不會崩潰的表式，當排除勞動力趕不上資本積累的這個因素時，反而出現了相反的結果。<sup>177</sup>

筆者認為，雖然以仿造再生產公式所設計的表式來解釋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的確是一個創舉，但是這一表式卻不足以闡明利潤率下降這一規律與同這一規律相伴隨的、由同樣的原因所引起的各種反作用力之間的辯證關係。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八章的開頭，馬克思假定勞動剝削程度，也就是剩餘價值率與工作日的長度，在一個國家的社會勞動所分成的一切生產部門都相同。在這裡，馬克思援引且同意斯密的看法認為，雖然不同部門中勞動剝削的程度不同，但是它會通過

---

<sup>176</sup> 在鮑威爾的表式中，第一年的數據是  $200,000c + 100,000v + 100,000m$ 。接著將它分為兩個部類，第 I 部類是  $120,000c + 50,000v + 50,000m$ ；第 II 部類為  $80,000c + 50,000v + 50,000m$ 。並且假定在充份就業的情況下，每年從剩餘價值中撥出 25%，以 4 比 1 的比例分別追加到兩部類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中。鮑威爾的表式只進行了四年，得出的結論是：如果這是一個封閉系統，則會出現危機。但不是盧森堡所說的剩餘價值無法實現的危機，而是剩餘價值生產不足所造成的危機。原因是勞動力的增長，趕不上資本積累的腳步所引起的工資的提高。相反地，如果是在一個開放的資本主義系統中，資本過度積累的國家可以透過資本輸出與引進他國勞動力，來解決本國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資本積累不足的國家則反之。將勞動力供給與資本積累速度兩個因素聯繫起來，鮑威爾認為，資本主義將可以通過前述這種方式自我調節，以避免經濟危機的威脅而不會發生崩潰。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1 1883-1929 (Hampshire: Macmillan, 1989), p.115~120.

<sup>177</sup> Henryk Grossmann,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p.74~76.

各種實際的或人們的偏見認可的補償理由而得到平衡。<sup>178</sup>雖然工資與工作日，從而剩餘價值率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或同一生產部門之間的平均化，經常會受到各種現實因素的阻礙。可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隨著其他一切經濟關係服從於這種生產方式，不僅資本可以任意地在一切生產部門中投資或抽出，且勞動力也不再受土地或各種職業公會的束縛而得以自由流動，因而這種平均化會日益形成。因此，馬克思認為，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一般研究時，可以將這些影響剩餘價值率平均化的阻力，看作偶然的或非本質的東西而暫時不加以考慮。從而馬克思在論述利潤率下降這一規律時，假定剩餘價值率為 100%。這樣的假定，不僅是為了理論上的簡便，更重要的是為了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一般時，假定各種現實關係是與它們的概念相符合，或者說，所描述各種關係只是表現它們自身的一般類型。因此，雖然各種現實的關係總是因區域性或各國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一般時，這些引起差異的各種現實的因素可以暫時存而不論。故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生產一般的角度，來考察利潤率下降的問題。

馬克思對利潤率下降的論述，基本上是扣著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這一矛盾發展起來的。所謂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須從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相對關係上來理解。前面提過，為了資本積累而投入的追加資本必須一部份轉化為不變資本，另一部份要轉化為可變資本。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的同時，追加資本也不斷地投入。因此，不論可變資本或不變資本的絕對量都提高了，可是追加資本中轉化為可變資本的部分與轉化為不變資本的部份相比，卻相對地減少了。利潤率是剩餘價值對總資本的比率，雖然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絕對量會相應地增加，但相較於生產資料的增長而言，卻相對地減少了，故利潤率必然會下降。但「利潤率下降，不是因為對工人的剝削少了，而是因為所使用的勞動同所使用的資本相比少了。」<sup>179</sup>筆者以為，馬克思實際上是以一種辯證的觀點來考察利潤率下降這一規律：

利潤率的下降和積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示生產力的發展來說，只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表現。積累既然引起勞動的大規模集中，從而引起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所以又加速利潤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又加速資本的積聚，並且通過對小資本家的剝奪，通過對那些還有

---

<sup>178</sup> 詳見：Adam Smith 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頁 91~137。

<sup>179</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74。

一點東西可供剝奪的直接生產者的最後殘餘的剝奪，來加速資本的集中。所以，雖然積累率隨著利潤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積累在量的方面還是會加速進行。<sup>180</sup>

由此可知，馬克思雖然將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所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當作利潤率下降的本質。但他並沒有排除與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這一過程同時發展的、現實中可能出現的各種起反作用的力量。例如，勞動剝削程度的提高、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不變資本各要素變得便宜、相對過剩人口、對外貿易以及股份資本的增加等等。<sup>181</sup>這些反作用的力量都能夠提高絕對剩餘價值率或相對剩餘價值率，使剩餘價值量從而利潤量得以增加。因此，在勞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即使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會促使利潤率下降，但利潤量卻能夠增加。<sup>182</sup>利潤率的下降與利潤量的增加，這兩種情況實際上可以同時並存而不矛盾，它們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勞動社會生產力發展這一過程的不同表現：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利潤率會下降，而利潤量會隨著所使用的資本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利潤率已定的情況下，資本增加的絕對量，就取決於現有的資本量。另一方面，在現有的資本量已定的情況下，它增加的比率，即它的增長率，就取決於利潤率。只有生產力的提高(前面已經提到，它總是和現有資本的貶值同時並進的)通過利潤率的提高使年產品中再轉化為資本的價值部分增加時，它才能直接增加資本的價值量。如果我們考察的是勞動生產力，那麼，只有相對剩餘價值由此提高，或不變資本的價值由此減少，就是說，只有加入勞動力再生產或不變資本要素的那些商品由此變得便宜，這種情況才能發生(因為這個生產力同現有資本的價值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二者都包含現有資本的貶值，二者都和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相對減少同時並進。二者都引起利潤率的下降，二者都延緩這種下降。其次，只要利潤率的提高引起對勞動需求的增加，它就會使工人人口增加，從而使可供剝削的材料

---

<sup>180</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69。

<sup>181</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58~268。

<sup>182</sup> 「利潤率趨向下降，和剩餘價值率趨向提高，從而和勞動剝削程度趨向提高是結合在一起的。」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67。



增加；而正是這種可供剝削的材料，使資本成為資本。<sup>183</sup>

雖然絕對剩餘價值率或相對剩餘價值率的提高，可以阻礙利潤率的下降，但不能制止它下降。因為「一定量資本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量，是兩個因數的乘積，即剩餘價值率乘以按該剩餘價值率使用的工人人數。」<sup>184</sup>因此，通過提高剩餘價值率來減緩利潤率的下降的種種辦法，終究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

只要生產力的發展使所使用勞動的有酬部分減少，它就使剩餘價值增加，因為它使剩餘價值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它使一定量資本所使用的勞動的總量減少，它就使人數這個在求剩餘價值量時和剩餘價值率相乘的因素減少。兩個每天勞動 12 小時的工人，即使可以只靠空氣生活，根本不必為自己勞動，他們所提供的剩餘價值量也不能和 24 個每天只勞動 2 小時的工人所提供的剩餘價值量相等。<sup>185</sup>

可見，使利潤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也阻礙利潤率的下降。這一規律由於受到反作用力的影響，使得它只具有趨勢的性質。但這些阻礙利潤率下降的反作用力，無論如何都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內起作用。因此，由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引起的利潤率的下降，相對於以剩餘價值率的提高來延緩利潤率下降的各種反作用力而言，前者還是占統治地位。亦即，縱使這些反作用力能夠暫時地提高剩餘價值率，從而使利潤率的下降得到緩解，但與資本主義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並進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終究占居主導的地位。因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意味著，相較於由機器、廠房設備、原料等等組成的不變資本而言，構成可變資本的工人人數雖然絕對量增加了，從而利潤量也增加了。但它的增加趕不上不變資本增長的速度，因此就利潤率來說，反倒是下降了。資本家階級為了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必須通過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來達到這一目的。然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促使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結果剩餘價值量從而利潤量雖然增加了，且剩餘價值率也提高了，可是利潤率卻下降了。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僅是剩餘價值，而且是在一定的週轉時間內儘可能快

---

<sup>183</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76~277。

<sup>184</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60。

<sup>18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76。

地自我增殖。因此，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重要的不僅是剩餘價值量的生產，更重要的是利潤率的提高。但是它為了達成這一目的所採取的各種手段，卻不斷地與它自身的目的相矛盾。故在馬克思看來，利潤率的下降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即使這一發展過程中，存在各種反作用力，但它們只能延緩由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所引起的利潤率下降，卻不能阻止它下降。

綜上所述，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性，即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這一過程的兩種不同表現方式，或者說同一個過程的兩個相反方向力量的辯證關係考察利潤率的下降規律。然而，格羅斯曼所設計的表式僅能從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這一個方面，來說明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而無法呈現出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同時並進的各種反作用力量，對這一規律所造成的影響。在馬克思的論述中，利潤率下降的規律並不是靜態地呈現，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這樣的辯證關係卻無法以表式的方式呈現出來。因此，筆者以為，格羅斯曼的表式的優點是，它明確地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這個造成利潤率下降的根本因素凸顯出來。但它的缺點在於，這一表式容易導致機械唯物論的觀點。

從另一個角度考察利潤率的下降，利潤擠壓論認為，工資的提高使得資本家的生產成本增加，無法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導致利潤率下降。這一流派的倡者經常援引**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三節「相對過剩人口」中的這個段落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只要為了資本主義生產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資本=0，那就會有資本的絕對生產過剩。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資本增殖，就是說，是佔有剩餘勞動，生產剩餘價值，利潤。因此，只要資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經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既不能延長這些人口所提供的絕對勞動時間，也不能增加相對剩餘勞動時間(後一點在對勞動的需求相當強烈從而工資有上漲趨勢時，本來是不能實現的)；就是說，只要增加以後的資本同增加以前的資本相比，只生產一樣多甚至更少的剩餘價值量，那就會發生資本的絕對生產過剩；這就是說，增加以後的資本  $C + \Delta C$  同增加  $\Delta C$  以前的資本  $C$  相比，生產的利潤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這兩個場合，一般利潤率也都會急劇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這一回是由資本構成的這樣一種變化引起的，這種變化的原因不是生產力的發展，而是可變資本貨幣價值的提高(由於工資已經提高)，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剩餘勞動同必要勞動比較的相對減少。

實際上事情可能是這樣：一部分資本全部或部分地閒置下來(因為

它要自行增殖就得先把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排擠出去)，另一部分資本由於受到失業或半失業的資本的壓迫以較低的利潤率來增殖。一部分追加資本是否代替舊資本，而舊資本是否因此算到追加資本中去，在這裡是沒有關係的。我們總是一方面有舊資本額，另一方面有追加資本額。這一回，利潤率的下降會引起利潤量的絕對減少，因為在我們的前提下，所使用的勞動力的量不能增加，剩餘價值率不能提高，因而剩餘價值量也不能增加，而且，減少了的利潤量卻要按增大了的總資本來計算。—但是，即使就業的資本繼續按原來的利潤率來增殖，因而利潤量不變，那麼，這個利潤量仍然要按增加了的總資本來計算，這也包含著利潤率的下降。如果總資本 1000 提供利潤 100，在增加到 1500 之後同樣只提供 100，那麼，在後一場合，1000 就只提供  $66\frac{2}{3}$ 。舊資本的增殖已經絕對減少。在新的條件下，資本 1000 所提供的利潤並不比以前資本  $666\frac{2}{3}$  提供的多。

但是很清楚，不經過鬥爭，就不可能發生舊資本這種實際上的貶值，不經過鬥爭，追加資本  $\Delta C$  也不可能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利潤率不是由於資本的生產過剩所引起的競爭而下降。而是相反，因為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的生產過剩產生於同一些情況，所以現在才會發生競爭鬥爭。原來執行職能的資本家會把他們手中的  $\Delta C$  部分或多或少地閒置下來，以便使他們的原資本不致貶值，使它在生產領域中佔有的地位不致縮小，或者，他們會使用  $\Delta C$ ，以使即使自己遭受暫時的損失，也能把追加資本的閒置轉嫁給新的侵入者，轉嫁給他們的競爭者。<sup>186</sup>

大多數援引此段來證明，馬克思本人也贊成利潤率的下降是由於工資提高引起的支持者，一般只引用第一段，並且把焦點放在倒數第二行括號內的「由於工資已經提高。」但如果從上下文脈絡來看，事實上，後兩段正是對第一段的說明與解釋。這裡所謂資本的絕對過剩是指，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引起的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得社會總資本與勞動力相比顯得過多了。並且，社會生產與再生產所需的勞動人口，也同樣因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不能再增加。這種情況表示，就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而言，社會生產所需的資本與勞動人口已經呈現出飽和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如引文的第二段與第三段所說，追加資本即新的競爭者爲了

---

<sup>186</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280~281。

自身的增殖，必須進入這個飽和的生產體系與舊的資本爭奪利潤。可是社會生產所必要的總勞動人口已經飽和而不能增加，所以新的競爭者只能以較高的工資來吸引勞動力，從而也就只能以較低的利潤率來增殖。故在這裡，馬克思所指的工資的提高是由利潤率的下降引起的資本的彼此競爭造成的，而不是利潤擠壓論所解讀的那樣。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馬克思所指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真正的根源，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消費不足、比例失調與利潤率下降等等不同形式的危機，不過是這個基本矛盾在資本的生產過程與資本的流過程彼此相互轉化過程中的發展形式與表現形式。從而它們是這個矛盾在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中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因此，這三種危機的形式在本質上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它們之所以表現出相互矛盾的現象，只是因為它們在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階段或領域不同引起的。

一切人類歷史的社會形式，必然存在與其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而何以生產過剩這種資本主義特有的、典型的經濟危機的形式，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卻是利益而不是危機？因此，僅是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歸咎於它自身的基本矛盾是不夠的。在下一章，筆者將進一步說明這個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形成哪些概念或範疇，而它們的發展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又如何使經濟危機成為資本主義無法避免的現象。

## 第四章 危機理論的建構

在這一章裡，筆者要分析，馬克思是通過哪些概念建構出經濟危機理論。在第一節中，筆者打算先介紹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這麼做的目的有二，一來有助於釐清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對象的分析有什麼根本上的差異。二來藉由馬克思對自己研究方法的分析，來理解**資本論**的邏輯與結構。在第二節裡，筆者要分析，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中分析出哪些概念，這些概念怎樣使得危機的得以被揭露出來。

### 第一節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主要集中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Grundrisse*，1857—1858 年手稿）導言」一文中。在這裡，筆者將就該文有關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與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兩部份作分析。

#### 一、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

馬克思指出，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是考察物質生產時的出發點。但這些個人決不是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孤立的獵人或漁夫，也不是被盧梭通過社會契約以建立彼此關係與聯繫的天生獨立的個人。這樣的個人只是假象。馬克思認為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虛構的個人是因為：

18 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 16 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 18 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曾在過去存在過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

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

187

與上述觀點相反，馬克思所指的個人不是脫離社會聯繫與自然聯繫而存在的獨立個體，而是從屬於某一個整體，並在其中進行生產的個人。他指出：

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衝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 18 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繫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係（從這種觀點來看是一般關係）的時代。人是最名符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在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時，可能會發生這種事——就像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sup>188</sup>

在對作為研究的出發點的個人作出區別以後，馬克思才接著談論生產。雖然生產總是指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但馬克思認為，在考察生產時，不需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加以研究，只需要把生產在一切時代所具有的共同點抽象出來即可。他指出：

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誌，共同規定。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覆，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不過，這個一般，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為不同規定的東西。其中有些屬於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

---

<sup>187</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 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

<sup>188</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2。

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sup>189</sup>

雖然上述的抽象方式，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的著作裡也能夠看到。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恰恰只注意到，生產在各個不同時代所具有的共同點，而往往忽略了這些共同點在不同時代所產生的本質上的差異。馬克思指出：

如果說最發達的語言和最不發達的語言共同具有一些規律和規定，那麼，構成語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於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為有了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裡已經出現了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係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於忘記這種差別。例如，沒有生產工具，哪怕這種生產工具不過是手，任何生產都不可能。沒有過去的、累積的勞動，哪怕這種勞動不過是由於反覆操作而積聚在野蠻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產都不可能。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係；這樣說是因為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積累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sup>190</sup>

接著，馬克思談到現在經濟學流行的作法就是在開頭擺上一個總論。以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著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為例，該書的第一篇第一章「論生產要素」就著重於探討那些在進行生產所必不可缺少的條件與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然而馬克思指出：

這一切並不是經濟學家在這個總論部分所真正要說的。相反，他們

---

<sup>189</sup> []內文字是編者所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3。

<sup>190</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3。

所要說的是，生產不同於分配等等<sup>191</sup>（參看穆勒的著作），應該被描寫成侷限在與歷史無關的永恆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於是資產階級關係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在分配上，他們則相反地認為，人們事實上可以隨心所欲。<sup>192</sup>

在作出上述的批判以後，馬克思強調：「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sup>193</sup>這裡的意思就是說，不能從構成生產一般的各種要素妄圖去理解任何現實歷史的生產階段，相反，必須將這些要素放置在一定的社會關係或生產關係當中，才能理解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恰恰相反，他們把消費、分配與交換拿來與生產並列，並由此形成一個正規的三段論法：「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sup>194</sup>政治經濟學的反對者們如果不是責備經濟學家把生產當作目的，轉而強調分配也是同樣重要的，就是認為應當把這些要素放在它們的統一中來考察。馬克思以為經濟學家固然是錯的，但反對者同樣也是錯的。他指出反對者的錯誤在於，他們和經濟學家一樣把分配同樣當作獨立的領域與生產並列，而且把這個問題僅僅看作是對概念的辯證平衡，而不是對現實關係的解釋。

針對古典經濟學家將生產一般的各種要素看作彼此孤立的領域，馬克思提出了自己關於這一問題的看法。首先，生產和消費。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只看到與消費同一的生產，直接與生產合一的消費，即生產的消費。至於原來意義上那種的消費，即與生產相對的起消滅作用的消費，馬克思指出，消費從兩方面生產著生產：

---

<sup>191</sup> 約翰·穆勒在該書的緒論中提到：「生產財富，從物質世界索取人類生存和享受的手段，顯然不是一件隨心所欲的事，而是有其必要條件的。...政治經濟學不研究這些，而只是予以默認，讓人們從自然科學或日常經驗中去尋找原因。...與生產規律不同，分配規律在某種程度上是人為的制度，因為某一社會中財富分配的方式取決於通行於該社會的法令或習慣。」John Stuart Mill 著，趙榮潛、桑炳彥、朱泱、胡企林譯，**政治經濟學原理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33~34。

<sup>192</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5。

<sup>193</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6。

<sup>194</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7。



(1) 因為產品只是在消費中才成為現實的產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其為現實的房屋；因此，產品不同於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後完成，因為產品之所以是產品，不在於它是物化了的活動，而只是在於它是活動著的主體的對象。

(2) 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後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作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sup>195</sup>

與消費相對應，生產也生產著消費，因而從生產方面來說：

(1) 它為消費提供材料，對象。消費而無對象，不成其為消費，因而在這方面生產創造出、生產出消費。

(2) 但是，生產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對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正如消費使產品得以完成其為產品一樣，生產使消費得以完成。首先，對象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產本身所中介的方式來消費的。饑餓總是饑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饑餓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饑餓。因此，不僅消費的對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僅在客體方面，而且在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所以，生產創造消費者。

(3) 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

---

<sup>195</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9。

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狀態和直接狀態，—如果消費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野狀態的結果，那麼消費本身作為動力就靠對象來作中介。消費對於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於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sup>196</sup>

故消費和生產之間的同一性表現在三方面：

(1) **直接的同一性**：生產是消費；消費是生產。消費的生產。生產的消費。國民經濟學家把兩者都稱為生產的消費，可是還作了一個區別。前者表現為再生產；後者表現為生產的消費。關於前者的一切研究是關於生產的勞動或非生產的勞動的研究；關於後者的研究是關於生產的消費或非生產的消費的研究。

(2) 每一方表現為對方的手段；以對方為中介；這表現為它們的相互依存；這是一個運動，它們通過這個運動彼此發生關係，表現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處於對方之外。生產為消費創造作為外在對象的材料；消費為生產創造作為內在對象，作為目的的需要。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這一點在經濟學中是以多種形式出現的。

(3) 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不僅直接是生產；生產也不僅是消費的手段，消費也不僅是生產的目的，就是說，每一方都為對方提供對象，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對象，消費為生產提供想像的對象；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中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由於自己的實現才創造對方；每一方是把自己當作對方創造出來。消費完成生產行為，只是由於消費使產品最後完成其為產品，只是由於消費把它消滅，把它的獨立的物體形式消耗掉；只是由於消費使得在最初生產行為中發展起來的素質通過反覆的需要上升為熟練技巧；所以，消費不僅是使產品成為產品的終結行為，而且也是使生產者成為生產者的終結

---

<sup>196</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10。

行為。另一方面，生產生產出消費，是由於生產創造出消費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於生產把消費的動力，消費能力本身當作需要創造出來。這第三項所說的這個最後的同一性，在經濟學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給、對象和需要、社會創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關係來說明的。<sup>197</sup>

但是馬克思強調上述對生產和消費的觀點，決不是像薩伊那樣簡單地把生產和消費等同起來，也不是將社會當作一個單一的主體來考察。薩伊錯誤地把生產出來的產品通通當作可以直接供人們消費的生活資料，而忽略了實際上構成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機器、設備與原料等等）也是產品的一部分。另外，就一個主體或許多個人的活動而言，生產和消費總是表現為一個行為的兩個要素。特別要強調的是，雖然消費作為必需和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生產是這個活動實際的起點，從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個過程藉以重新進行的行為。

然而，在社會中，產品生產出來以後，生產者對產品的關係就成了一種外在的關係，產品要回到主體，取決於主體和其他個人彼此之間的關係。因此，分配藉由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總產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額，從而出現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因此，馬克思接著要探討分配和生產之間的關係。

其次，生產和分配。馬克思指出在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中什麼都被提出兩次。例如，在分配方面出現的是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在生產方面作為生產要素出現的是土地、勞動和資本。因此，馬克思指出：

說到資本，一開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兩次：（1）作為生產要素；（2）作為收入源泉，作為決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東西。因此，利息和利潤本身，就它們作為資本增長和擴大的形式，因而作為資本生產本身的要素來說，也出現在生產中。利息和利潤作為分配形式，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它們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們又是資本的再生產方式。

同樣，工資是在另一個項目中被考察的雇傭勞動：在雇傭勞動的場

---

<sup>197</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10~11。

合勞動作為生產要素所具有的規定性，在工資的場合表現為分配的規定。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雇傭勞動，那麼，勞動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最後，地租——我們直接來看地產參與產品分配的最發達的分配形式——的前提，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大地產(其實是大農業)，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資的前提不是勞動一般一樣。所以，分配關係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於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產上來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來談，等等，這完全是幻覺。

因此，像李嘉圖那樣一些經常被人責備為只看到生產的經濟學家，卻專門把分配規定為經濟學的對象，因為他們直覺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會中的生產各要素藉以得到確定的最確切的表現。<sup>198</sup>

由此看來，分配好像是先於生產，並決定生產。似乎不是由生產來安排和決定分配，而相反地是由分配來安排和決定生產。但馬克思指出：

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於一定的生產關係)——這是同一關係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並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確定了。正因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來理解現代生產並且主要是研究生產的經濟學家李嘉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sup>199</sup>從這

---

<sup>198</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12~13。

<sup>199</sup> 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原序中就指出：「在不同的社會階段中，全部土地產品在地租、利潤和工資的名義下分配給各階級的比例是極不相同的；...確立支配這種分配的法則，乃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Piero Sraffa 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頁3。

裡，又一次顯出了那些把生產當作永恆真理來論述而把歷史限制在分配範圍之內的經濟學家是多麼荒誕無稽。<sup>200</sup>

可見，正因為拋開了生產和分配的這種內在聯繫，使得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將生產和分配看作彼此孤立的領域割裂開來，以致於產生把資本主義生產視為永恆的生產方式，而似乎只有分配才是歷史的產物這樣的錯覺。至於由生產本身決定的分配與生產之間的關係，乃是屬於生產內部的問題。馬克思指出：

如果有人說，既然生產必須從生產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發，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先於生產，成為生產的前提，那麼就應該答覆他說，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提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並且對於這一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於前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它們在生產本身內部被不斷地改變。例如，機器的應用既改變了生產工具的分配，也改變了產品的分配。現代大地產本身既是現代商業和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現代工業在農業上應用的結果。<sup>201</sup>

因此，分配對於新的生產時期雖然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一般歷史的產物，並且是一定歷史的產物。因此，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和分配的關係，必須從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係之中來考察。

最後，交換和流通。流通本身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說它是從交換總體上來看交換。既然交換不過是生產和由生產決定的分配一方與消費一方之間的中介要素，而消費本身如前所述又是生產的一個要素，故交換也就作為生產的要素包含在生產之內。因此，針對生產和交換之間的關係，馬克思指出：

第一，很明顯，在生產本身中發生的各種活動和各種能力的交換，直接屬於生產，並且從本質上組成生產。第二，這同樣適用於產品交換，只要產品交換是用來製造供直接消費的成品的手段。在這個限度內，交

---

<sup>200</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14。

<sup>201</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14~15。

換本身是包含在生產之中的行為。第三，所謂實業家之間的交換（筆者按：即生產生產資料的資本家之間的交換），不僅從它的組織方面看完全決定於生產，而且本身也是生產活動。只有在最後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於生產之旁，與生產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結果，也就沒有交換；（2）私人交換以私人生產為前提；（3）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sup>202</sup>

綜上所述，馬克思對生產、消費、分配與交換之間的關係作出結論是：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sup>203</sup>

由此可知，在馬克思看來，生產一般的各種要素，即生產、消費、分配與交換構成一個整體的各個環節，或者說形成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雖然生產從片片上來說，在一定的情況下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但整個過程總是以生產為出發點，從而生產對其它要素總是起著支配的作用，並且決定這些要素彼此之間的一定關係。

---

<sup>202</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16~17。

<sup>203</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17。

## 二、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在一開頭馬克思就談論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麼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進的規定之後，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

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

後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中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sup>204</sup>

---

<sup>204</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18。

馬克思這一段關於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兩種方法的論述，經常被錯誤地解讀為：「從具體到抽象是錯的，而從抽象到具體才是對的。」筆者認為，馬克思在這裡要表達的東西，是聯繫著前一個部分關於「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的論述的。在前一個部份，馬克思強調：「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sup>205</sup>古典經濟學家們的作法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分析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但沒有研究它們在不同生產階段中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就把它們直接拿來應用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相反，馬克思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正確方法是：把這些一般關係抽象出來以後，還要考察他們在不同的或特定的生產階段上是怎樣起作用的，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不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不是像黑格爾（Georg W. F. Hegel）那樣把現實當作絕對精神外化的結果。而只是用思維來掌握具體，並將它當作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sup>206</sup>馬克思在這裡區別了「現實的具體」與「思維的具體」，亦即「現實」與「理論」的分別。但理論不是脫離現實之外，或駕於其上而由思維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相反，馬克思在這裡要強調的是，現實先於思維且兩者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的唯物主義觀點。

然而上述所說的這些抽象的一般關係或者簡單的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馬克思認為，要看情況而定。首先，以貨幣為例，在資本、銀行、雇傭勞動等等存在以前，貨幣就已經在歷史上存在過。從這個方面看，思維的發展與歷史的發展相一致。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在比較不成熟的社會形式中，存在協作與分工等等高級的經濟形式，卻不存在貨幣。因此，貨幣決沒有經歷一切經濟關係，它並不是人類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範疇。

其次，再以勞動為例，馬克思指出：

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它在這種一般性——作為勞動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

---

<sup>205</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6。

<sup>206</sup>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著，李其慶、馮文光譯，**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頁94~96。



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係一樣，是現代的範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存在於貨幣中的物。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侷限地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學派相對立的重農學派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產品一般，看做勞動的一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侷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還是土地的產品。

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一乾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物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遠，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學派的觀點上去，就可想見了。這會造成一種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做為生產者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最簡單，最原始的關係找到了一個抽象表現。從這一方面來看這是對的，從另一方面看來就不是這樣。

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以一個十分發達的實在勞動種類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種類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所以，最一般的抽象只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的地方，在那裡，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再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具體的勞動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的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裡，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是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種特殊性上同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在這裡，「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範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真實的東西。...

勞動這個例子確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關係的產物，而且只有對這些關係並在這些關係之內才具有充份的意義。<sup>207</sup>

因此，馬克思在這裡強調，雖然勞動由於它為一切人類社會所共有，才能成為一切生產階段最抽象的範疇。但就勞動的規定性本身，例如，勞動的方式或形式等等，在不同生產階段卻不一定相同。因而，必須把勞動放置在這些不同生產階段的關係中來理解，才能顯示出充分的意義。

然而，這些抽象的範疇彼此之間的關係，在特定社會形式中又是怎樣決定的呢？馬克思指出：

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裡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與的；因而範疇表現這一定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

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它是同土地結合著的，而土地是一切生產的源泉，並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sup>208</sup>

馬克思以為，每一種社會形式都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生產，而它決定著該社會其他一切生產的關係。但這個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又是以什麼方式來決定它與其他一切生產的關係呢？馬克思說道：

---

<sup>207</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21~23。

<sup>208</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24。

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先後次序來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看來是它們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次序的東西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佔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sup>209</sup>

綜上所述，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形式，而這個社會內部的一切經濟範疇彼此之間的關係都由「資本」來決定，並且它們在這個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與影響，也要按照「資本」的邏輯來安排。馬克思的**資本論**便是按照這一邏輯來開展的。

## 第二節 資本積累的危機理論

在上一節，馬克思已經清楚地說明，他是按「資本」的邏輯來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而在這一節，筆者要進一步地分析，馬克思是通過哪些概念與範疇的確立與發展，來建構出他的危機理論。

不論社會的形式如何，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總是必須不斷地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生產剩餘價值，而不是消費。爲了這個目的，資本家必須將一部分剩餘價值用來擴大再生產。而資本積累就是「把剩餘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餘價值再轉化爲資本。」<sup>210</sup>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社會的再生產過程就表現爲資本積累的過程。既然再生產過程是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可見，經濟危機的根源必然包含在資本積累的條件中。接下來，筆者首先要考察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有哪些概念與範疇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相聯繫的。

---

<sup>209</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25。

<sup>210</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635。

## 一、剩餘價值範疇的確立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sup>211</sup>商品流通過程的結果是：商品不斷地退出流通並且被將它當作使用價值的買者消費掉，而貨幣卻仍舊在流通過程中繼續它的旅程。貨幣作為這一過程的最後產物是資本的最初表現形式。而當作貨幣的貨幣與當作資本的貨幣有怎樣的區別呢？用  $W$  代表商品，用  $G$  代表貨幣，就可以把這兩種形式表示為：簡單的商品流通： $W-G-W$  與資本的貨幣流通： $G-W-G$ 。在前一種形式中，貨幣只作為物物交換的媒介，為買而賣。而後一種形式中，商品作為價值增殖的中介，為賣而買。

在簡單商品流通中，等式的兩極是價值量相等，但使用價值不同的商品。這種交換體現著社會勞動不同物質的交換，使用價值是交換的目的。而在貨幣資本的流通中，等式的兩極都是貨幣，等量的貨幣相交換沒有意義，因而它們只能有量的區別。這一交換的目的是，從流通中取出的貨幣多於起初投入的貨幣。因此，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  $G-W-G'$ 。 $G'=G+\Delta G$ ，即原來的貨幣額加上一個增殖額。馬克思指出，「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餘額叫做剩餘價值。可見，原預付價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量，加了一個剩餘價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sup>212</sup>

然而剩餘價值是怎麼來的呢？「如果是等價物交換，不產生剩餘價值；如果是非等價物交換，也不產生剩餘價值。流通或商品交換不創造價值。」<sup>213</sup>可見貨幣要轉化為資本，必須要在市場上購買到一種特殊的商品。不過基於等價交換的規律，剩餘價值不可能是從這種商品的價值變化上而來，而只能從這種商品的使用中得來。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因此，它的實際使用本身就是勞動的物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sup>214</sup>這種具有特殊使用價值的商品就是勞動力。

但是，貨幣所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必須存在兩個條件：

---

<sup>211</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67。

<sup>212</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72。

<sup>213</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86。

<sup>214</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90。

貨幣所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裡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  
215

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歷史的特殊性造成的：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這種關係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係，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係。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sup>216</sup>

從而，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關鍵：

如果考察一下貨幣，我們就會看到，貨幣是以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高度為前提。貨幣的各種特殊形式，即單純的商品等價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貯藏貨幣和世界貨幣，按其中這種或那種職能的不同作用範圍和相對占優勢的情況，表示社會生產過程的極不相同的階段。但是根據經驗，不很發達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這些形式的形成。資本則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誌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sup>217</sup>

勞動力的使用或者說勞動過程如何產生出剩餘價值呢？勞動者、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這三者的結合，是人類進行生產的必要條件，是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從而勞動過程作為「製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爲了人類的需要而佔

---

<sup>21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92。

<sup>216</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92。

<sup>217</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93。

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恆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sup>218</sup>但價值增殖過程則不然。資本家之所以要生產商品，只是因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因此，一方面他必須生產具有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生產商品；另一方面他要使生產出來的商品價值，大於他為生產該商品所預付在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價值。「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一樣，商品生產過程必定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sup>219</sup>從而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就是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那麼，生產出來的商品價值與資本家為該生產所預付的資本之間的差額是怎麼來的呢？馬克思指出：

包含在勞動力中的過去勞動和勞動力所能提供的活勞動，勞動力一天的維持費和勞動力一天的耗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前者決定它的交換價值，後者構成它的使用價值。維持一個工人 24 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種情況並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勞動力能製造棉紗或皮靴的有用屬性，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勞動必須以有用的形式耗費，才能形成價值。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即它是價值的源泉，並且是大於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這就是資本家希望勞動力提供的獨特的服務。<sup>220</sup>

通過區分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的價值的差異，馬克思論證了剩餘價值如何在符合等價交換規律的基礎上也能生產出來。從而也就解決了李嘉圖無法解釋的，利潤如何從資本與勞動的交換中產生的問題。

---

<sup>218</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208~209。

<sup>219</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211。

<sup>220</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219。

## 二、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區別

馬克思按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在產品價值的形成上起的不同作用，將構成資本的兩個組成部分分爲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資本中變爲生產資料及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而只是將自己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稱爲不變資本。而變爲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中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它除了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外，還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轉變爲可變量，因此稱之爲可變資本。<sup>221</sup>因而，在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中，只有可變資本即轉化爲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才是剩餘價值的唯一源泉。

馬克思從剩餘價值的來源上，將資本區分爲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這兩個部份，從而也就揭示出社會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社會性質：

各個人藉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生產關係，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係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係。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係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的社會關係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並且，難道不正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爲資本的嗎？

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並且還包括交換價值。資本所包括的一切產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僅

---

<sup>221</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235~236。

是若干物質產品的總和，並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換價值、若干社會量的總和。<sup>222</sup>

### 三、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

資本家想要提高剩餘價值可以透過「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兩方面來著手。絕對剩餘價值是靠延長剩餘勞動時間的方式來取得的。在勞動生產力不變的情況下，工作日長度決定了資本家能剝削的剩餘價值量。而相對剩餘價值就是在不改變工作日的前提下，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即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所必要的時間，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比例而產生的剩餘價值，叫作相對剩餘價值。<sup>223</sup>而要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就必須從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即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來提高勞動生產力，從而改變工作日的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兩個組成部分的比例。

「因此，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並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衝動和經常的趨勢。」<sup>224</sup>這也就揭示了為什麼關心交換價值的資本家，總是力求降低商品的價換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通過發展勞動生產力來節約勞動，目的絕不是為了縮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為了縮短生產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sup>225</sup>

上述這些概念與範疇構成社會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的條件，從而也就是資本積累的條件。「生產具有資本主義的形式，再生產也就具有同樣的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過程只表現為價值增殖過程的手段，同樣，再生產也只表現為把預付價值作為資本即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來再生產的手段。」<sup>226</sup>因此，唯有再生產的條件能夠滿足資本積累的目的，資本的積累過程才能不斷地進行下去，否則就會造成干擾，甚至中斷而引起危機。既然社會的再生產過程是生產過

---

<sup>222</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45。

<sup>223</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350。

<sup>224</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355。

<sup>225</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356。

<sup>226</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621。



程與流通過程的統一，那麼，對資本積累過程的考察，也要從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來分析。

剩餘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但由這個目的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卻使得平均利潤率呈現日益下降的趨勢。因為，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可變資本相對於不變資本的日益減少，即生產剩餘價值的活勞動相對於死勞動而言越來越少。雖然利潤率也可以因為其他的原因暫時下降，但這是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所得出的必然性。因此，利潤率下降首先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領域發生的。

其次，剩餘價值雖然在生產領域中產生，不過在資本家手裡，這個剩餘價值是以使用價值即商品的形式出現。這些商品還必需通過流通領域轉化為貨幣形式，當剩餘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對資本家而言，這時他才是真正地「佔有」剩餘價值。因此，一旦流通領域內的商品形式與貨幣形式彼此的轉化過程發生干擾，也會引起危機從而使利潤率進一步下降。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指的就是資本積累的危機理論。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性質，使社會的再生產以資本主義的形式來進行。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勞動生產得以進行的條件不外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相結合。但這些條件的結合方式與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表現為，一方面是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階級，另一方面是只有勞動力可以出賣的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通過不斷地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來增加剩餘價值，從而降低工人的工資。可是，以商品形式被資本家階級佔有的剩餘價值的實現，卻受到資本家階級本身積累的欲望與工人階級有限的工資所制約。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地與它自身社會關係的限制相矛盾，使得資本積累的條件無法順利地再生產出來，而這一過程則不斷地以經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從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考察，經濟危機一方面表現為資本積累條件的破壞，另一方面又是資本積累的條件重新恢復的辦法。而從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或生產關係的角度來考察，經濟危機一方面造成資本家階級的一部份破產與資本積聚，另一方面則造成工人階級的一部份失業與勞動條件的惡化。可見，只要社會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不廢除，那麼經濟危機就會週期地發生。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這個週期運動表現為：沉寂狀態、逐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崩潰、停滯、沉寂狀態，如此不斷地反覆循環。經濟危機作為這一運動的崩潰階段具有雙重的意義，它既是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即資本積累過程的破壞，也是這一過程的重新恢復的轉戾點與起點。從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危機時期不過只是現代工業社會生產週期的一個特殊階段，它代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爆發

與這一矛盾的暫時解決。但如前所述，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以雇傭勞動制度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再生產形式不廢除，資本主義社會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就不可能根絕。因此，馬克思所謂的「崩潰」一詞指的其實就是經濟危機時期，它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週期的一個特殊的階段，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條件。相反，馬克思提出危機理論的目的是，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不可避免的客觀缺陷即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令生活在這一制度的人們—不論是資本家階級、地主階級或工人階級<sup>227</sup>—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與矛盾，進而通過對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的革命來推翻這一制度。



---

<sup>227</sup>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 12。

## 第五章 結論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認為資本主義不會發生經濟危機是由於，一方面，爲了反對重商主義把貨幣當作財富的唯一形式，他們將貨幣貶低爲交易的工具，從而也就把商品交換看作本質上與物物交換無異；另一方面，則是因爲他們沒有意識到，社會生產從封建主義的形式轉變爲資本主義的形式的過程，發生了質的變化。因此，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內部，對於資本主義會不會發生經濟危機的爭論，也只能侷限於生產與消費之間平衡與否這一點上。例如，薩伊以爲，買賣雙方實際上需要的，是彼此產品的使用價值而不是貨幣本身。從而他也就將以價值增殖爲目的的商品交換，看作是與物物交換無異的行爲。而李嘉圖除了贊同薩伊前述觀點以外，他更進一步認爲，人對消費的欲望是無限的，因此不會出現生產過剩，反倒是存在一個無法被滿足的消費需求。可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沒有看到，雖然一個社會所能夠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量，由與該社會相適應的客觀的社會生產力決定。但是消費（不論是生產性消費或個人消費）卻不是由個人主觀的願望或欲望決定，而是受到該社會的生產關係制約的。這一點不但是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起點，也是他危機理論的分析基礎。

然而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家們，卻沒有能夠從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爲主軸，來解讀他著作中有關經濟危機論述的相關段落。而是圍繞著消費不足、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與利潤率下降等三種觀點，爭論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例如，第二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權威理論家考茨基，從市場的擴大速度趕不上生產的擴張速度這個角度，來詮釋馬克思著作中看似消費不足的論述段落。正是因爲考茨基將馬克思以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出發所作出的，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描述本身當作原因。使得每當資本主義的新發展顯示出能夠克服原來被當作危機原因的情況時，或者出現原先的論點無法解釋資本主義新情況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對引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就會因此改變。這種情形也使得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本身受到質疑。筆者以爲，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原因就在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家們沒有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來理解馬克思著作中的有關經濟危機的論述，從而往往就把馬克思關於這一基本矛盾，在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上的表現形式或產生出來的現象描述當作經濟危機的原因造成的。這種情況也使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發展幾乎處在停滯的狀態。

事實上，如果扣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來理解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就會發現消費不足、生產部門比例失調與利潤率下降三種流派，它們不過是這一基本矛盾

在資本的再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與發展形式。不過這個論斷只是就資本的邏輯本身即「資本主義生產一般」來說，或者說在僅就經濟範疇來考察的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至於對現實的經濟危機發生原因的分析，筆者同意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提出的「多元決定」的看法。<sup>228</sup>雖然經濟危機的因素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中，但決不能說現實危機的爆發也一定是由經濟因素引起的。使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可以是與經濟因素相關的，也可是無關的，例如戰爭、天災或疫病等等。只要它能夠使資本積累發生干擾，都可以成爲現實危機爆發的原因。另外，國家也能通過政策干預來延緩經濟危機的爆發。可見，現實中經濟危機的爆發與否，是由許多正反不同的力量的共同作用的結果，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只是「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因素。

雖然社會再生產過程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並且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壓榨也是一切階級社會所共有的，然而何以這一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卻經常地受到經濟危機的干擾？在封建社會裡，「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爲特徵的。但是正因爲人身依附關係構成該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用不著採取與它們的實際存在不同的虛幻形式（筆者按：這裡指的是商品形式）。它們作爲勞役和實物貢賦而進入社會機構之中。」<sup>229</sup>因此，在封建社會中，生產的目的是使用價值，而地主憑藉土地所有權從農民那裡佔有的，是直接可供消費的一定量剩餘產品。「相反，剩餘價值一開始就作爲總產品的一定部分的價值而存在。」<sup>230</sup>勞動產品轉化爲商品的過程不斷發展，使一種特殊的商品即金或銀脫穎而出，擔任一般等價物即貨幣的職能。貨幣作爲交換價值或者正確地說價值的獨立形式有兩種意義，一方面，資本家必須通過流過程將商品轉化爲貨幣，才算是真正佔有剩餘價值。因此，它作爲價值的獨立形式使資本的增殖成爲可能。但另一方面，貨幣做爲交換過程的中介，使商品的形態變化分爲買與賣兩種行爲。因此，一旦貨幣轉化爲商品或商品轉化爲貨幣的過程，在資本積累過程的任何一個點上發生困難，那麼經濟危機的爆發就是可能的。正因爲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剩餘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故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任何一種使價值發生變動的因素，都會引起資本積累的障礙。從而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自然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

---

<sup>228</sup> Louis Althusser 著，顧良譯，**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76~120。

<sup>229</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94。

<sup>230</sup> Karl Marx 著，**資本論第一卷**，頁636。

最後，馬克思所謂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究竟是什麼？筆者以為，不論是從生產部門的比例失調論、利潤率下降論或消費不足論，甚至多因論與綜合論，都無助於理解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全貌。相反，必須從社會再生產過程出發，即必須將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聯繫起來考察，才能夠準確地掌握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因為社會的再生產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過程，即表現為資本自身價值增殖的過程。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這就是說，對社會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而言，生產的目的不僅僅只是為了生產使用價值，更重要的是生產剩餘價值來使資本增殖。一旦社會的再生產無法滿足資本增殖的目的，或者說，資本積累的過程不斷地遇到障礙。那麼，社會的再生產過程就會發生干擾甚至中斷，這些干擾或中斷就會不斷地以經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如果不扣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來理解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論述，就會混淆經濟危機之所以產生的原因與它的各種表現形式。如果不扣著社會再生產過程或資本積累過程來考察經濟危機的各種表現形式，就會將這些表現形式相互對立起來。從而，也就無法理解這些表現形式不過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同一個過程，即資本積累過程的不同階段所遇到的各種障礙的不同表現方式或現象。

隨著資本主義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社會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可變資本作為剩餘價值的源泉與總資本相比卻不斷相對減少，造成平均利潤率越來越下降。另一方面，社會總產品的價值中，歸資本家階級所有的那部份越來越多，而歸工人階級的那部份則越來越少。因此，前者引起剩餘價值生產的危機；後者則造成剩餘價值實現的危機。這兩種情況不僅不矛盾，還可以同時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發展，就越是與它的目的相悖，從而資本積累的過程就不斷地以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正是要說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地受到它的社會關係的桎梏，使得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地受到破壞與阻礙，從而週期性的經濟危機自然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產物。因此，他提出危機理論的目的，是要使讀者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並闡明這種生產方式客觀上不可避免的缺陷即週期性的經濟危機。通過對這一缺陷的論證，從而也就提供了共產革命的必然性與正當性的基礎。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份

Heinrich, Michael, 「存在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嗎？—進一步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中的『危機』概念」,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北京), 2009 年第 4 期 (2009 年 4 月), 頁 11~20。

Karl Marx 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資本論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Karl Marx 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資本論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Karl Marx 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資本論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 **盧森堡文選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 **盧森堡文選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王玉芬，**從重商主義到馬克思—剩餘價值發現的歷史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著，何欽譯，**政治經濟學新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

David McLellan 著，李智譯，**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第三版（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Joseph E. Stiglitz 著，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台北：大塊文化，2004年）。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著，李其慶、馮文光譯，**讀資本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John Kenneth Galbraith 著，沈國華譯，**1929年大崩盤**（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

John E. Roemer 著，汪立鑫、張文瑾、周悅敏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Meghnad Desai 著，汪澄清、鄭一明譯，**馬克思的復仇—資本主義的復甦和蘇聯集權社會主義的滅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Ravi Batra 著，官如玉、羅耀宗、游兆正譯，**浩劫 1990**（台北：卓越出版社，1987年）。

林鐘雄，**西洋經濟思想史**，第六版（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河上肇著，何仲珉譯，**資本論入門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河上肇著，何仲珉譯，**資本論入門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金寶瑜，**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5年）。

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 著，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譯，**壟斷資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

Manuel Castells 著，晏山樞、楊立義、蔡平、劉憲章譯，**經濟危機與美國社會**（台北：唐山出版社，1987年）。

殷敘彝編，**伯恩施坦讀本**（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John Maynard Keynes 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高安邦，**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

Adam Smith 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4年)。

Adam Smith 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Piero Sraffa 編，郭大力、王亞南譯，**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郭大力，**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

Ian Steedman Paul Sweezy and others 著，陳東威譯，**價值問題的論戰**（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Jean Baptiste Say 著，陳福生、陳振驊譯，**政治經濟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Paul Sweezy 著，陳觀烈、秦亞男譯，**資本主義發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Ravi Batra 著，陳正芬譯，**葛林斯班的騙局**（台北：經濟新潮社，2005年）。

陳岱孫，**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說發展論略**（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

Anthony Brewer 著，陸俊譯，**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3年）。

Nikolai Bukharin and Rosa Luxemburg 著，紫金如、梁丙添譯，**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Ravi Batra 著，黃曉風譯，**世界大恐慌**（台北：傳文文化出版社，1995年）。

Thomas Malthus 著，廈門大學經濟系翻譯組譯，**政治經濟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

楊世雄，**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楊健生，**經濟危機理論的演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

Rudolf Hilferding 著，福民等譯，**金融資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John Stuart Mill 著，趙榮潛、桑炳彥、朱泱、胡企林譯，**政治經濟學原理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

John Stuart Mill 著，趙榮潛、桑炳彥、朱泱、胡企林譯，**政治經濟學原理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

劉明遠，**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和週期理論的結構與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9年）。

蔣自強、張旭昆、袁亞春、王如芳，**經濟思想通史第一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

蔣自強、張旭昆、袁亞春、王如芳，**經濟思想通史第一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

蔣自強、張旭昆、袁亞春、王如芳，**經濟思想通史第二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

蔣自強、張旭昆、袁亞春、王如芳，**經濟思想通史第三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

蔣自強、張旭昆、袁亞春、王如芳，**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

Eric Hobsbawm 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1914-1991（下）**（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

Eric Hobsbawm 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1914-1991（上）**（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

E. P. Thompson 著，錢乘旦、楊豫，潘興明、何高藻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

E. P. Thompson 著，錢乘旦、楊豫，潘興明、何高藻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下）**（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

Eugen von Böhm-Bawerk 著，鄭學稼譯，**馬克思體系的完結**（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67年）。

Louis Althusser 著，顧良譯，**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Roman Rosdolsky 著，魏墳、張彤玉、沈玉玲等譯，**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著，顧海良、張新等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1929~1990**（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顧海良，**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當代視界**（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

顧海良、張聲雷，**20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

顧海良、張雷聲，**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歷史與現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顧鈺民、陳思明，**西方經濟學流派**（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3年）。

## 二、英文部分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trans. by G. M. Goshga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Attwell, Paul,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Bernstein, Eduard, *Evolutionary Socialism*, trans. by Edith C. Harve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1).

Clarke, Simon, *Marx's Theory of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Dobb, Mauric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Freeman, Alan and Carchedi, Guglielmo ed., *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US: Edward Elgar, 1996).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8 (Summer 1989), pp. 3~18.

Gillman, Joseph Moses,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Marx's Law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ism* (London: Dennis Dobson, 1957).

Grossmann, Henryk,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trans. by Jairus Banaji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Horowitz, David ed., *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Howard, M. C. and King, J. E.,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1 1883-1929 (Hampshire: Macmillan, 1989).

Howard, M. C. and King, J. E.,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2 1929-1990 (Hampshire: Macmillan, 1989).

Luxemburg, Rosa,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Mandel, Ernest, *Late Capitalism*, trans. by Joris De Bres, Verso Classic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9).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 by Samuel Moor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2).

Marx, Karl, *Capital*, trans. by Ben Fowkes, vol. 1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Marx, Karl, *Capital*, trans. by David Fernbach, vol. 2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Marx, Karl, *Capital*, trans. by David Fernbach, vol. 3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Marx, Karl, *Grundrisse*, trans. by Martin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Poulantzas, Nico,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rans.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Verso, 1979).

Rosdolsky, Roman,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trans. by Pete Burgess, Second(unabridged) paperback edition, vol. 1 (London: Pluto Press, 1989).

Rosdolsky, Roman,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trans. by Pete Burgess,

Second(unabridged) paperback edition, vol. 2 (London: Pluto Press, 1989).

Sraffa, Piero,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